

统一书号: T7072·3

定 价: 0.20

目 录

- 在苦难的日子里魏淑珍(1)
- 地狱天堂 两个人间刘慧霞(27)
- 三代人的血泪刘晓珍(40)
- 我的一家任大海(54)
- 我的身世刘碧华(68)
- 翻身不忘昔日苦苑广金(79)

在苦难的日子里

国棉二厂女工 魏淑珍

我要永远记住过去，我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。我应该先告诉大家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魏淑珍。因为有党，我才能活到今天，才能在这里向我们自己阶级的兄弟姐妹讲我的家史。

一

我是个苦孩子出身，在我还没出世之前，我那一双苦命的爹娘已经在苦海里扑通了多半辈子。现在还是从我父亲的身上讲起吧。我的父亲名叫魏国有，原籍是河北省滄县前里寨村。这地方十年九涝，有点地的主儿一年到头紧抓挠，还是保不住温饱，像我们这样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的穷苦人家就更没辙了。我的父亲给外村的地主扛活，常年不在家。我娘魏张氏领着我的三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在家过着艰难的日子。我姐姐大经才六岁就跟着娘拿麦蔸掐草帽辫子，为的是赶集卖俩钱儿换点粮食吃。我大哥魏宝成、二哥魏宝文也整天背个筐在漫洼野地拾柴拾粪，或是

給人家放牛放羊。那时我三哥还是个怀抱的娃娃。一家大小就是这样整天忙活，总也填不饱肚子；渾身上下穿得七窟窿八眼睛，和要飯的花子差不多。夏天还好办，到了寒冬腊月，冰天雪地，一家人真是有今个沒明儿。这样一年一年地苦熬着，熬到何时是头，何时是了喇！……

一九二六年上冬，我爹听人说：天津卫那大地面好找事由儿，錢也好掙，至不济，要飯吃也能鬧个肚儿圆……我爹听得耳朵发了热，心也活了。爹是老实人，他倒沒有发财致富的念头，只是想：人是活的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挪挪窝儿，兴許也能混口飯吃。和娘合計合計，他們俩就带着哥哥、姐姐上了天津卫。

我爹带着一家大小来到天津卫，真是俩眼儿黑搭糊，投亲无亲，靠友无友，只得随着一大帮从乡下流亡到城市的穷苦人在西广开落了脚。

我爹賃不起房子，只好像别的穷哥們那样，买了几根竹劈子插在地下，在竹劈上搭了两領席，又抹上了点儿泥，一家六口就窝窝憋憋住在那里面。安頓好以后，爹就忙着出去卖短儿，我大哥和二哥就去拾毛籃、撿煤核儿，娘也到鋪子里去攪紡綫的活儿。一家大小紧忙活，还是顾不上嘴；再說，已經进了腊月，河水都上冻了，全家人身上又缺棉衣，一个个冻得稀稀溜溜的，实在让人心急。这时娘打听得給人当奶媽能掙几个錢，狠狠心把三哥扔給姐姐大經，自己到宁家大桥宁公館当了奶媽。

我三哥那时还不到一生日，乍一断奶，餓得臉上淨剩

了汗毛，黑夜白日地哭嚎。姐姐見小弟弟哭得太可憐，又沒的給他吃，只好拿塊棉花蘸點兒水讓他嘍。娘回到家，看看小兒子那可憐樣，心就跟刀剜的那樣痛。娘正抱着我三哥傷心落淚，老家來的翟大姐來串門，一見三哥那個樣，就說：

“瞧把孩子熬克的！孀子，依我說，不如叫孩子逃活命，得倆盤纏錢還是回老家吧。在鄉下，熱天拾拾麥子，冷天打打柴禾，不比這兒活便的多？這地方多死相啊！”

娘看看懷里的孩子，想想也是，這樣下去，未見得能拉扯成人。跟我爹一商議，爹也覺得只好走這條路，就把三哥賣了。中間人把三哥抱走那工夫，我娘摟着我大哥二哥和姐姐，哭成了淚人兒。只聽說那個人家是作官兒的，是青縣人，要帶着孩子回老家，別的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三哥哥一給人，娘成天光哭，寧公館也不去了，她像得了魔症似的老跟我爹哭：“小升子（三哥的乳名）離開天津，我也不能再在天津活下去啦！咱們走，馬上就走，馬上就走！”

就這樣，全家由六口人變成了五口人，又回到了老家前里寨村。

回到老家，我爹還是到外村去扛活，我的兩個哥哥還是上地拾柴禾，娘和姐姐大經還是在家掐草帽辮子，一切都和從前一樣，只是少了個三哥哥。日子一長，愁吃愁喝還愁不過來，娘把三哥就忘下了。第二年夏天，娘又生了第二個閨女，就是我。娘給我起了個名字叫老肥。因為我

生下来又瘦又小，娘說：“瘦得可怜巴巴的，叫个老肥吧，盼她能长得肥实点。”也是在这年，娘把十二岁的姐姐大經送到婆婆家童养去了。家里少了一张吃饭的嘴，作爹娘的还可以少操一分心。

这年，很多邻村鬧饥荒。上秋，我們前里寨村来了个逃荒的姓童的老爷爷，我爹在外村扛活时和他熟識的。这老爷爷左手提个瓜蛋似的小包包，右手領个十四五岁的小閨女。他告訴我爹跟我娘：这小閨女是他的孙女儿，孩子的爹娘都得病死啦，家里又顆粒未收。他們爷俩是沿路討要着来到这儿的。他說他知道我爹和我娘都是老实人，想把孙女儿給我大哥魏宝成当媳妇，为的是把孩子安置个地方，他老头子也好奔条活路。这老爷爷唉声叹气地說：他苦熬苦拽了一輩子，沒成想熬到七十多岁，土埋头頂的人啦，却落得这般光景……

常說的，“穷人疼穷人”，娘一听这老爷爷的話，早就难过得落泪了，再看看这小閨女，虽然穿得破破烂烂，餓得瘦筋耷拉，可是双眼皮，大长眼睫毛，长得特別俊，早就爱得不行。这时，娘就說了：“宝成的爹，咱把孩子留下吧。”其实我爹心里也早願意啦，就一口答应了。

童老爷爷亲眼看着孙女儿和我大哥成了亲，才算是了却一桩心事，提起小包包，跌跌撞撞又上路了。从此再也没有音信。

我們一家子在老家又苦熬了二年，实在呆不下去，只好又奔天津卫。来到天津，自然是又奔西广开，好歹賃了

兩間土壁房住下。我爹和我大哥出去当小工子，扛河壩，我二哥那年才十来岁，长得很瘦弱，还是拾毛籃、撿煤核儿，娘又出去当老媽。白天家里只剩下我嫂子和我。那时我才两三岁，还是个拖着两筒鼻涕的髒娃娃，任事也不懂。我嫂子可是越长越俊，門口儿那些地痞流氓常找上門来，說些不干不淨的混帳話。嫂子胆儿小，哪敢出門，吓得钻在屋里光是哭，公公婆婆回到家她也不敢告訴。

正在这时，娘又生了一个老兄弟，因为坐月子，暂时沒有去跟主儿。这天擦黑，天阴得很，下着小雨。娘隔着窗帘喊：“老肥嫂子，拾拾院里那两双破鞋。”喊了好几声，沒有答应，娘叫我出去找找看。我跑出去喊嫂子，在院里叫，又跑到街坊邻居家叫，都沒有。我跑回来告訴娘：“嫂子沒有啦！”娘一听就急了，也顾不得坐月子，頂着小雨到处找，把嗓子都喊哑啦，再也找不到嫂子。娘一屁股坐在街心，呼天喊地地哭了起来：

“孩子啊，你这一走好狠心呀！你叫爹娘怎么跟你那孤苦的老爷爷交代呀！”

娘哭，我哭得更欢，嫂子沒有啦，娘再出去当老媽，誰跟我就伴儿呀……

我們娘俩正哭着，爹受完累回来了，一看这光景，更是着急，天天出去找，还托人給打听，但是再也听不到嫂子的音信。爹只好唉声叹气地劝我娘：

“死了这条心吧。孩子也許找到好地方享福去啦。跟着咱們也是受罪。”

事情过去一年。这天，我正在胡同口玩耍，一个新从关外回来的老乡走来叫我：“小老姑，这来，看看这是誰的像片儿。”我过去一看，是个烫头发的小媳妇，长得挺俊的。我说：“俺不認識。”

这老乡說：“再看看，这不是你嫂子嗎？”

事情让父亲知道了，急忙把这老乡找来，打听嫂子的下落。原来这老乡去年到奉天給日本人出华工，在街上看見了我嫂子。嫂子托人邀他到妓院去見面，說是有要紧的話跟他說。老乡想法去了。嫂子一見他就哭了，說当初她是上了孙胖子的当（孙胖子騙她說領她去找爷爷），被卖到这儿的。她說她死也不願过这种非人的生活，叫那些王八犊儿打得渾身是伤；她把一張像片儿給了这个老乡，要他回来告訴公婆。想法把她救出火坑。

那老乡話还没有說完，我娘早掌不住抽抽噎噎哭了起来，說：

“可怜的孩子，还想着咱們呢。宝成他爹，救她吧，想法救出她来吧。”

我爹一听，儿媳妇是被孙胖子拐走的，登时气得臉色煞白，咬牙切齿，发誓要跟孙胖子拼命。原来这孙胖子就在西广开住，是个远近聞名的破鞋，生着一臉橫肉絲子，又黑又胖，却爱俏，脚上老是穿双小白鞋，脑袋上梳的大盘头却纏滿了紅綠絲綫儿。她販卖人口，在这一带无恶不作，沒人敢惹。我們一家子在这块儿老实得出了名，从不沾这些坏人的边儿，现在竟骑上脖子来痲屎，爹想想不拼

命真是活不下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爹就跑到衙門把孙胖子給告了。沒去之前，爹发狠地說：“我要給这一方除害，不光是为了咱的孩子！”可是第一堂回来，爹耷拉了脑袋，一声不响；第二堂回来，爹唉声叹气，摔打正在啼哭的老兄弟，把我吓得躲得远远的，不敢吭气；第三堂回来，我那剛强的爹臉色慘白，一头扎在炕上，只听他說：“宝成他娘，这事咱別告了，这个世道沒咱穷人說話的地方！”

爹这一扎头就沒起炕，只过两天，就得了夹气伤寒死了，临死只說得半句話：“宝成的娘，我好恨……”

我大哥丢了媳妇心里本就很难过，現在父亲又为自己的事眼睁睁被恶霸气死，他越想越对不起老爹，白天哭，黑夜也哭，把两眼哭得肿成了大鈴鐺，先以为是发眼了，穷人哪把发眼当回事，他仍是难过，仍是啼哭。这天早晨，大哥从炕上爬起来，睁眼一看，眼前黑糊糊的一大片，任嘛东西也沒有，他寻思，是头晕上火鬧的？使劲把眼揉搓揉搓，再瞪着眼看，还是一片黑糊糊。他心里一急，要下炕，一脚踩空，跌倒在地上。从此，我的大哥成了个双目失明的瞎子。

大哥瞎了，不能出去受大累。二哥就要担起养家的担子，赁了一辆破胶皮要去拉車。可怜我二哥，那年才十三岁，空长个大个子，又瘦又弱，哪拉得动？远地方他又不熟悉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大哥也是个剛强人，就說：“瞎是瞎了，可不能吃闲飯，当累贅！老二，你拉車，我在后面

推，这天津卫我哪儿都干过，我给你領路。”这样，我的两个哥哥就出車了。別看是两个人又推又拉，有錢人怕伤“体面”，还不願坐他們的車哩。常常是，两辆胶皮一块儿搶生意，結果总是我的两个哥哥被人家刷下来。有时就是只他們这一辆胶皮攬座儿，顾客也是皺皺眉，摆一下手不坐。像这样，还要給車厂子老板出車分儿，能买棒子面的錢就很少很少了。实在拉不来錢，也不能睜眼挨餓呀，瞎大哥就叫我拽着他到西車站去要飯，要点臭臭烘烘的殘羹剩飯，就合一頓是一頓，就合兩頓是兩頓。

娘見实在沒法維持，又到宁公館当老媽去了。家中只剩下我和老兄弟老偏。那年我才四岁。白天我抱着老兄弟在胡同口呆一天，好容易盼到晚，娘回来了，娘給捎回点人家吃剩的点心渣子，喂喂弟弟，这一天就算交代了。

为了等娘，不管好天坏天，我都領了老兄弟到胡同口轉游。老兄弟哭了，我就哄他：“瞧，咱娘来啦、給老偏捎好东西来啦。”

有一天傍黑，刮着大風，天气非常寒冷，我还領着弟弟在街筒子里等娘，街坊邻居看見都喊我：“唉，真是孽障，快家去吧。看把孩子冻着！”我說：“老偏要等娘，回家他哭啊。”我們沒有回家。

果然，又出事了，到夜間，老偏就发起高烧来，燒得昏迷不醒的，燒着燒着，忽然抽搐起来，抽搐一陣之后，紧接是“吱吱”尖叫，直直鬧了一夜，全家人只好干瞪眼看着。到早晨，弟弟开始安靜下来，娘又去宁公館了。可是，

娘剛走不大工夫，老兄弟又抽搐起来，不久就气絕身死了。

我只怕娘伤心难过，等她一回来，我赶紧趴在娘身上，把臉貼着娘的怀，一双手摟住娘的腰，要哄娘。哪知娘一声也沒哭，只噙着滿眼的泪花說：“这样更好，沒墜我腿的了。”唉，在当时我哪懂得娘这句话的辛酸？哪懂得娘的泪是向肚內倒流？还只当娘真的想开了呢！……

二

瞎大哥跟着二哥推了几年車，二哥就不让他帮忙了。大哥叫我到鋪子里領些棉花来紡綫。这时我已經八岁了，也跟着大哥一块儿紡。瞎子大娘看見，就夸我：“魏娘，瞧你的閨女多灵巧，小手儿紡綫紡得好溜呀。”娘听了，就叹气說：“这也是生活逼的啊！”

紡綫得坐在地下紡，一紡就是一整天。日子长了，成年人都腰酸腿疼，像我这样的孩子更頂不住啦。慢慢地我就站不起来了，勉强站起来，也得扶着墙根走，两条腿从骨縫里向外疼，疼得呲牙咧嘴的，可我不敢在娘的跟前露相儿，更不敢跟娘說，怕娘听了难过呀！

經過数不尽的腌心事，又长年累月吃不飽穿不暖，娘的身子骨儿已經糟蹋得够呛了，可是她还硬撑着在宁公館当老媽，一直当到我九岁那年，娘得了一场很厉害的热病（伤寒病），公館的太太怕傳染，把娘辞掉了，从这，娘才呆在家里。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已經占領了天津，穷苦人

的日子更不好过，棒子面都吃不上，果仁餅、山芋干还得起五更去挨个儿哩。轉过年来，有很多孀子大娘都往工厂跑，她們不願意上鋪子里領活儿干了。那黑了心的猴儿崽子掌柜的說是让你紡一斤棉花，拿回家来秤一秤，二斤还冒头儿呢。换个鋪子試試吧，天下老鴿一般黑，“大肚子弥勒佛”比黑了心的猴儿崽子掌柜心更坏。紡綫簡直掙不上吃喝。人們說：“他們就是喝咱血，扒咱皮，也不給他干啦，上工厂去！”

那年我剛滿十岁，也裹在人流里进了岸和田工厂。

每天早晨，娘把一小撮豆皮或是一小块果仁餅塞在我的衣兜里让我带着，算是午飯。吃午飯那时候，看見別人都拿出东西来吃，我也把果仁餅从兜里掏出来，剛要往嘴里送，一下子想起娘来：娘給我們分完吃的之后，那淺子里連点渣儿也沒剩，娘这一天沒的吃呀！这时候我的嗓子眼里像堵上了什么，肚里虽然咕呱乱叫，可連口水也不想咽了。我把果仁餅塞回衣兜又去干活儿。回到家一看，娘果然餓着肚子等二哥呢，等他拿回拉車的錢好去买豆皮儿。我心一酸，赶紧从兜里掏出那块果仁餅，裝出乐呵呵的样子說：

“娘啊，你先吃这块吧！”

娘問我：“給你的，为嘛不吃？”

“娘，你吃吧，別人給我东西吃啦！”我哄娘說。唉，都是些穷人，我怎能吃別人的呀？人說“家貧出孝子”，孝不孝的不管它，我們穷苦人家的孩子倒是懂事早，是叫艰

难的日子逼的呀！

这岸和田工厂是日本人开的厂子，日本人顾不过来，不常进車間，那些小把头却一天到晚在車間晃蕩，见我年岁小好欺侮，整天打我罵我，我就像个人球似的，任人踢来踢去。强忍着干了一年，娘见我实在受屈，就不让我去干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仍跟着娘和瞎大哥紡綫儿，有时也去割絨、擇鋪衬，攬上嘛活是嘛活儿，实在沒活儿干就去拾毛籃、撿煤核儿。赶上阴天下雨，領不来活，瞎大哥就叫我拽着他去要飯。日子确实难呀！

这时，人們又在嚷嚷：有个織洋袜子、扎衬衣的万松洋行招女工，还說那儿倒是不老打人的，娘忙着叫我跟着人們去了。

剛去倒还好，沒有挨过打，就是每天搜腰特别严。有一天下了班，管搜腰的馬大姑对我說：“你到前头大桥底下等我去，有話跟你說。”

在那大桥底下沒有人的地方，这个吊眼角的姪娘們向我說：“跟你說个事，以后見天見下班出来，你得給我偷綫。不叫你白偷，一定不打你，也不叫別人打你。听见沒有？”

我一听登时就楞神了，別看我穷里生，穷里长，长到十来岁，可从沒偷过东西呀！馬大姑见我怵怵憚憚的，一下子变了臉，眉梢眼角吊得高高的，强压低了声音說：

“是我搜腰，你怕的嘛？告訴你，要是不听话，我就跟

日本人說去，不让你干啦。瞧瞧你，又瘦又小，到这儿作工的有你这样儿的嗎？哼，我要是一說呀，日本人一准开除你！”

这一吓唬，我沒了主意，只好点头认可了，我多么害怕他們不要我呀！真是，我这样瘦这样小，能混上厂面儿实在不易！

从此，我天天給馬大姑偷綫，每天下班，我把綫纏在腰上，或是装在褲兜里，到牆子河大桥下等着馬大姑来拿。

每天这样，我也习以为常了。一天，我又在腰上纏了綫往外走，走到离搜腰不远的地方，我才看見馬大姑每天站的那儿換了另外一个人，心就“崩崩”地跳开了，往回走吧，干活儿的屋子早上鎖了，心說也許馬大姑跟这个人打招呼了，翻出来不碍事的。我就壮着胆子走过去，一下就叫这人翻了出来，立刻就被扯了一頓嘴巴，然后筋斗趔趄地把我揪到后院那个打人的地方。日本鬼子大喊大叫地让人剝了我的棉袄，渾身上下只剩一条褲衩儿，倒背双手把我綁在挂着冰凌的大树上。这时正是阴历十一月的夜晚，天干冷干冷的，把我冻得渾身青紫，磕打牙儿，脑瓜子都失去知觉了……也不知又捱了多长时间，忽嚕嚕一帮打手来了，拿鞭子把我好一顿抽，直把我抽得皮开肉綻、血忽淋漓。边打还边問：“說，偷几回啦？說！”

我心一橫，把馬大姑让我偷綫的事都說了出來，这样日本鬼子才把我放下来。我摸到家門，鸡就叫第一遍了。

隔着窗戶紙，我看見屋里还掌着灯，晃着很小很小的灯亮儿。我赶紧擦干眼泪，忍住啼哭，輕輕捱进屋去。可別把娘惊醒啊！

哪知門一响，娘就說話了：“哪儿去了？急得我一宵也沒合眼儿，唉，真让人揪心啊！”原来娘在炕上坐着等我呢。

“加夜班啦。”我回答，这是我在进門时一下子想起来的假話啊！說完這句話，我再也支撐不住了，一头扎在炕上。

娘信實了，急忙起来，让我就着热被窩赶紧睡一觉。

我說：“不，不睡，一会就得走，还得上班呢。”

“加了夜班还不让人歇会儿，”娘說，“穷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錢！”

我没有回答娘，不敢多說一句話，我怕自己带哭的声韵儿让娘听出来，在娘面前可不能挂出受气的样儿。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馬大姑那天沒有来是因为临时生病了。她一上班，我可就遭殃了，見天見借着搜腰的工夫，这个吊眼角的狠娘們咬牙切齿地掐我，擰我，踢我，踹我，把我收拾得渾身是伤，沒一处好地方。

我和娘合睡一个被窩。怕娘看見身上的伤，天天晚上我團團个儿钻被窩，不敢脫衣裳。

娘可說了：“这傻孩子，累累巴巴一天，不脫了衣裳睡怎解乏！”

我說：“娘，穿着衣裳睡暖和。”

娘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，真也没法儿，娘儿俩扯着一条精薄的稀烂被，睡一宿也不敢直直腿！简直造孽呀！”

过几天，娘又叨叨：“肥啊，还是脱了衣裳睡吧，娘搂着你。”

我只好编句瞎话，把娘搪塞过去。

又过几天，娘还是催我脱衣服，没办法，只好再编瞎话搪塞娘。

娘看我一再吱唔，便起了疑心，急忙扒下我的衣服一瞅，浑身上下青一块，紫一块，大血疙瘩翻翻着，流脓打水的，没一处囫圇地方……娘一把搂住我，大哭了起来：“他们好狠的心哪！……傻孩子，怎么——不说话，饿——饿死咱也不干啦！”

我们娘儿俩抱头痛哭一场，第二天娘横竖不让我去上班了。

不上班，只好在家里跟着大哥一块儿纺线。后来，听人说有个富士洋行正招锁扣眼的女工，每月关半袋黑面。黑面可是好东西，那时候我们穷人连棒子面都吃不到嘴呢。这样，我又跟着岁数大的人们到富士洋行上工去了。

这是个小场面儿，总共才三十来女工。日本资本家有很多这样的小洋行，自己忙不过来，这富士洋行就交给他的儿子管着。他儿子是个油头粉面的坏家伙，总跟我嘻皮笑脸，还老动手动脚的。

一天，给大伙领活的三姐忽然跟我說：“小不点儿呀，

告訴你一件事。小鬼子叫我跟你媽媽說說去，要叫你給他當太太。”

“嘛是當太太？”我問。

“咳，真是個任嘛不懂的傻孩子，他要叫你給他當媳婦唄。”三姐說，“誰干這個缺德事，我才不去說哪。”

我一聽，不由得生氣了，就撅嘴說：“我才這麼大點，能給人當媳婦？就是當媳婦也不能給‘小鬼子’當呀！”

一天，“小鬼子”竟自己找我，叫我回家跟娘說說。這下可真把我肺氣炸了，恨不得咬他幾口。

回家的路上，三姐囑咐我：“可不能跟你娘說啊，要說了她一准不讓你來啦，不來，你們吃嘛呀。”

在當時我真是一丁點兒主意也沒有，我急得哭了說：

“‘小鬼子’還說叫我明天給他回信兒呢。我可咋着說呀！”

三姐給我出主意：

“你就告給他，說你娘不樂意。以後咱大伙兒一塊來一塊走，有我們給你保鏢，他敢怎樣的！快別擦眼抹淚兒啦。”

我記住三姐的話，第二天就原封不動地端給了“小鬼子”。這一下可把他惱透了。從此，他每天帶着滿臉的殺氣，走進干活兒的屋子，照着我的腰眼，“當”的就是一腳，把我踢個嘴啃地，還叫那個壞了腸子的中國翻譯找碴兒揍我。

我在这儿干了不到一年，怕出事，就又不干了。

三

在旧社会，作娘的活着是指儿指女，而我娘指儿指女的心比别人更盛。可大哥瞎了以后，我娘心里眼里指的就是我二哥魏宝文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大姐大经在我九岁那年得了个倒行血的妇女病已经死掉了，娘疼我，我也知道疼娘，但是娘有自己的心思，她觉得再怎么我也是个闺女家，终究要出门子的，出了门子就是人家的人啦。娘嘴里没说，心却扑在二哥身上。挨饿呀，受大累呀，她能负很大的辛苦，当娘的有指望呀。我二哥是她的命根子呀！

但是，就是这么一条命根子，万恶的旧社会也给她夺走了。

一天，娘在外面干完活儿回来，见二哥盖着条破烂被在炕上躺着，她心一惊：“老二从没回来这样早过，准出事了！”忙走近前一看，只见二哥嘴角淌着血，脸像死人一样。问是怎么回事，才知二哥拉着拉着车，忽然大口吐血了，吐得晕了过去，多亏拉车的穷哥们把他送回来。娘听了，真像晴天打了一个霹靂，浑身散了架子似的，一下瘫在二哥跟前，哇地一声就哭了。

二哥从得病就落了炕，哪天也吐几口血，街坊邻居看了，都说是肺病。娘知道肺病是个富贵病，得吃好的，喝好的，还得拿药扶着才能养好，穷苦人得上这个病只有死。可娘硬是不往这上想。大夫请不起，就寻偏方儿。听人说，胡萝卜有营养，又说红皮蒜能治肺病，娘就买来给二

哥蒸了吃。

二哥这一鬧病，一家人更得抓撓着找活儿干，天天家里只剩下一个垂危的病人。每天，我干完活儿回来，二哥就叫我：

“快过来，跟二哥說說話儿。”

不管多累，我也听话地坐在二哥身边跟他說話儿。我知道二哥悶得慌，他恨不能亲的热的老守着他才好哪。二哥不错眼珠地瞅着我說：“老肥呀，等二哥好了，能多挣俩錢儿，就不让你出去干活儿啦。二哥一定好好养着你，把你养活到三十，才让你出門子呢。”

我知道二哥为嘛說这话，我姐姐大經要不是在婆婆家受气还死不了呢。我看着二哥那深陷的两眼，像死人的骷髅，不由得呜呜地哭了起来，就說：

“二哥，别——別說了，我——我知道你——疼我……”

“咱們还能老这样，总——总有好——好——的一天……”二哥說不下去了，一阵急促的咳嗽，嘴里噴出了血星子……

二哥沒少吃胡蘿卜、紅皮蒜，娘让他吃他就吃，他还盼着赶紧治好病拉車呢。可是他的病不但沒有治好，倒加重了。他吐血越吐越邪行，后来不是吐簡直是噴，噴在上一大滩，就凝成了厚厚的血冻子。人瘦得光剩一把骨头，煞白煞白的，但他越是病重越要我坐在身边跟我說話儿。

“老肥呀，二哥难望好了，二哥要是死了，你可好好疼咱娘，咱娘不容易呀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我死了，你可想着到車厂子找找刘掌柜，要俩錢儿，你們好貼补着过日子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告訴娘，我死了，千万别拉賬买棺材，拿領席卷了就得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我听着这些伤心話，嗚嗚嗚地光是哭，一句話也說不出来。

一天，睡到半夜，二哥又大量吐起血来，他直着两眼，两只手一劲儿抓撓我，像是还要跟我說什么，可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出来，不一会，就閉上眼睛沒气儿了。

二哥这一死，娘再也不能出去干活儿了，她整天楞楞怔怔地想一陣哭一陣，又向我数数叨叨地說一陣。她特別願意說老話儿，說我爹是怎么怎么气死的；說我大姐沒走过一天父母运儿，死的又是多么可怜；說她早就听人傳說，她那可怜的儿媳妇怎么怎么剛强，叫老鴛子逼的上吊死了……一天，她忽然想起了早已卖給人家的三哥：

“唉！当初錯了主意，为嘛把他給人家呢。这会儿，瞎的瞎，小的小，我可指誰呀！”

娘說着說着又哭起来。我没办法，只有劝娘別难过，說或許有一天能够找到三哥呢。娘听了我的話，她那灰蒙

蒙的眼睛里閃出一綫亮光儿，說：

“听說那家人回了青县，青县离这不远，我去找找。”

娘一心要上青县，去找三儿子。她东拼西凑，借了几个盘纏錢，真就上路了。我也半信半疑的，心里想，真要找到三哥，娘不哭了可就好了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娘討要着从青县回来了，瘦得像把柴禾，两眼直直勾勾，說沒有找着三儿子。

“还是等我的老二吧。”娘說。当时誰也沒有在意。

从这，每天傍黑时候，娘就提个小板凳，坐在街門口，两眼直勾勾地向胡同口望着。

人們觉得奇怪：瞎子在家哪，老閨女也沒出門，她可在这儿望誰呢？

“魏娘，起風啦，家去吧！”人們說。

“等我的二儿呢。他拉車去啦，一会儿就回来啦，等他拿回錢来好叫老閨女买豆皮去。”

娘說得牙白口清的，听話的人身上起一层鸡皮疙瘩，不敢再問，扶起娘往家走。娘忽然搥胸頓足号啕大哭起来：

“我那老二呀，你可死得苦呀，想块点心吃娘也沒給你买呀！……”

这声音好凄惨，我和大哥也跟着她同声哭，哭得院中的邻居都落泪了，他們劝娘：“唉，这都怨这鬼世道，穷人沒法活啊！你哭不也是哭不活他啦！身子骨要紧呀！”

娘的脑子挽住了扣儿，再也解不开啦。她明白一陣，糊塗一陣，明白起来就哭老二，哭自己沒指望；糊塗起来

就提个小板凳坐在門口等二儿子。見娘这样，我大哥急得里出外进地轉磨磨，在娘面前苦苦求娘：“娘啊，別想老二啦，这不还有我哪，討着，要着，瞎儿子也要养活你……”但娘哪里听得进去，仍是哭个不停。她本来就瘦弱得不行，这样折腾了沒一年，就臥床不起了。

娘自知不行了，就托人給我寻婆婆家，她口口声声不放心老閨女，又說不願給瞎儿子留累贅。我說妥婆家才几天，娘就跟这个充滿愁苦的世界告別了。临死，娘把大哥和我叫到面前，反反复复地說：

“咱家整整齐齐九口人，我这一死，只剩两口了，咱們的人死得好屈喲！……”

娘死后，我大哥瞎迷糊眼地連借带求买了一口薄皮棺材，将娘埋葬了。又过一个多月，大哥忽然对我說：“妹妹，哥哥对不起你。还是让人家把你娶了吧，省得跟着瞎哥哥受罪啦！”

那时候我才十六岁，哭得迷迷糊糊的，让人家娶着走了。

婆婆家有一大家子人：公公、婆婆、大伯、小叔子，还有一大帮侄男弟女，也是指着受大累过日子。丈夫比我大十岁，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，扛河壩、当小工子，嘛活儿都干。公公婆婆喜欢我老实肯干活；我呢，总觉着自己生来是个受苦的孩子，能有一大家人热热乎乎地过日子也挺好的。只是一样，出了門子，还是不够吃的，丈夫养活不了我。結婚剛剛一个月，就又央人到公大六厂上工了。

剛来时，日本人还没走，当然还是和从前一样受气。不久日本就投降了。工厂里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。我想，这下兴许能强点儿，再怎么都是中国人。心里一高兴，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大名，就叫魏淑珍。这时，我由原来的粗纱车间调到了布场。在粗纱是扫地，到这儿是学织布，要是学会了织布，比扫地还能多挣两个钱。我心里想得满好的。谁知来到这布场，当上小学徒，整天依然受累，学不到一点技术。

事不凑巧，我不久又怀了孕，干活更困难。把头见我上茅房次数多了，就沉下脸来斥打我：“泡蘑菇怎么的？告诉你，这样可不行！”

“我不是泡蘑菇，不知怎么闹的，老想解小手，晚去一会儿就溺在裤里了。”我照实告诉她。

把头才不希罕听这个，回答我的是白眼加唾沫星子。

又过些日子，我的全身都肿了，脚肿得更厉害，像两个发面馒头，连丈夫的大鞋都穿不进去。我的身体太瘦弱，怀孕期间浑身都是病，可是一天班我也不敢歇，歇一天就少一天收入，那怎么行！当然我更没有半点儿要当妈妈的喜悦，只是发愁：孩子生下来之后工厂还要不要我啊？要是不要了又怎么办？……越想越觉得今后的日子是个无底的深渊，是永远没有白天的黑夜，就不敢往下想了。

四

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天津市响起了解放的炮声。

在月子里我还没有出屋門，天津市的劳动人民就在紅旗下解放了。可是我还什么也不知道呢。

孩子剛滿月，我就火燒火燎地来上班。我是作着挨打挨罵的准备来的。可是一进車間，我就暗暗地奇怪了：把头們說話为什么都变得柔声細气的？还問我在月子里养得好不好，孩子的奶水够吃不够吃，是不是需要再歇几天班……他們一面說着，臉上还出現了討好的笑容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話語对答好啦，光是“嗯哪”“嗯哪”的。轉过臉儿，找个跟我一起干活的大姐說：“哟，怎么的啦，为什么这些人都变啦？”大姐笑了：“傻妹子，不变也得行！咱还得跟他們算老賬呢，过去把咱欺负苦啦！”噢，我明白了，工人翻身啦！是因为共产党来啦！

不久，工厂开了个工人訓練班，我去听課。在这里我才懂得了什么是“阶级”，什么是“剝削”。那时候，我还不会很好地联系自己，可是我相信爹、娘、哥、嫂和姐姐都死得太屈，共产党要是早来几年，肯定地說，我家九口人誰也死不了。想了又想，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憎恨旧社会，听課听得更起勁儿了。第二天，很早很早，我就进了厂子，把那間听課的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、一尘不染，然后端端正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一会儿姐妹們陆陆續續来了，都很奇怪：“魏姐，你怎么来得这样早？”

我說：“高兴得睡不着觉，就进来啦。坐吧，我把桌椅都打抹干净啦。”

我长这样大，第一次这样舒暢，这样快乐！第一次有

了当主人的感觉！

女儿忽然生病了，咳嗽发烧，小脸憋得通红，是着凉了。我想起十几年前死去的老兄弟老偏。这症状不是和老偏一样吗？老偏只抽了一夜风就死掉了，那惨象一合眼就在眼前。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又没有作妈妈的经验。正发愁又怕，车间的工会主席、委员都登上门来看我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现在的医院是为咱们劳动人民服务的，快抱着孩子去看吧，可别耽误了。”临走，放在桌上十五块钱：“孩子病了，一举一动都得用钱，先花这个。不够了咱再想办法。”

我心里好喜欢，眼泪却嘩嘩地流个不停，送走了这些知疼知热的亲人，就抱着女儿到儿童医院去治病。大夫说是气管炎，打针吃药后，很快，孩子又欢蹦乱跳了。

我心里想：没有别的说的，得好好干活！我不声不响，认认真真地织布，总不出次布，受到了党的奖励。

可是那旧社会让我从小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累，虽然岁数不大，我的身子骨儿却坏了。不过我是苦孩子出身，不懂得上医院，身子不得劲儿，有个头疼脑热，硬撑撑就过去了。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，我是一概不知，一概不晓。一九五三年全厂职工工作了一次普遍的体格检查，这一下，我的症状才暴露了。大夫很郑重地告诉我，说我有比较严重的肺结核，需要治疗，需要休养。当时我心一惊，肺结核？不就是要了二哥命的那个肺病吗？不过我没害怕，也没着急，我知道有党就有救，却暗暗生自己的气：这个不争气的身子骨呀，还得休养，这一来得少织多少布！为了

赶紧治好病，我按照大夫的嘱咐，打针吃药，不敢间断，大夫还给我开了到营养食堂就餐的病号证。可是我总也忘记不了织布，每次检查，先问大夫：“您看，什么时候我能上班儿呀？”大夫说：“别老问这，到了该上班的时候，我自然给你开证明的。”我只好憋着不问。又养了一个时期，照照镜子，觉得脸上很见胖，色气也不坏，过过磅，体重增了不少。我想：“这回可行啦！”立刻跑去要求大夫给开复工证明。

“不行，刚见好，你还不能上班。”

“还不行？”我急了，“我在家呆不下去呀，都一年多啦。”

“呆不下去也得呆，”大夫笑着给我作解释，“有病嘛，先说养病。”

我这人不能说不会道，肚里有千言万语，叫人家一句话满给截回来了。

我回到家里，又想了好久，还是想要求上班的理由。第二天，我又坐在大夫面前了，我说：

“大夫呀，我还是得上班儿，上了班儿心里高兴，兴许好得更快呢。”

“这样吧，明天我给你验一下血沉。开复工证明得有科学根据。”

第二天，验了血沉，大夫还是劝我休养，我可真急了，我这个不爱说话的人，这次居然叭叭叭地说了一大串，我说：

“大夫呀，在家呆了这些天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不安？說是工人吧，一寸布也不給国家織，說是家庭妇女吧，我可月月跑到厂子来关錢。像这样，我怎么能够安心养病呀！我这心里也过不去呀！”

我說着，心里一陣发酸，眼睛里嘩嘩地流泪了。在过去，急着上洋行是为吃为喝为活着，今天急着上工厂，是为了报答人民，报答党，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設！

我这眼泪倒是很見效，大夫見我急成这样，就一面耐心地解釋不开复工证明的原因，一面說自己对病人情感的适应作得也不够，掌握得也太死板，他劝我不要着急，明天先給我开复工证明試一試。

这天早晨，推門一看，外面是鋪天盖地的大雪，那雪大棉花套子似的，还在紛紛揚揚地下着。我急忙梳洗一下，就进厂了。大夫剛上班，第一个就看見了我，倒把他逗乐了，說：

“嚯，这魏姐，下这么大的雪还来！”

“下雪子也得来。”我也乐了，心里着实高兴呀！

有一次，在路上遇見了工厂的大夫，他忙着叫住我，說：“魏姐，我听說你看八部車，那怎么行！要記住，你的体质太弱！”

我一听就笑了。那时候我織的是一种出口布，就想：“那里的人民还在遭难呢，可能比我从前还苦呢。我家遭难那功夫，我連老子娘都顾不了。現在我却能够支援他們啦！”因此，我就这样回答那大夫：

“大夫呀，你說我的体质不好嗎？我这心气儿可高呢，我这高昂的心气儿就是不服气什么‘体质’、‘体质’的！”

現在，工厂領導調我在布厂檢查科檢查布的质量，說，这个工作需要大公无私、一心秉正的人。在这里，正因为我时时刻刻記住党告訴的这句话，又被評为先进工作者。

跟我一起翻身解放的瞎哥哥，現在也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員，在民政局办的盲人工厂当工人。他手巧，心又灵，干麻活都是能手，他也是总先进，总受表揚。別看瞎了眼，因为生活在集体里，領導又无微不至地照顾，瞎哥哥总說自己現在是生活在天堂里，全身好似浸着蜜汁。他还老說：“別看我瞎，可我这心头好像点上一只明灯似的亮堂。是共产党的光把我这颗心照亮啦。”有时候，我带着孩子們去看他；有的时候，他也来看我，哥俩坐在一起，暢談着思想、生产和生活的情况。

每次見面，瞎哥哥总是摩挲着我的孩子們說：“想不到，想不到呀，咱們家能有这么好的宝贝！”我就說啦：“得感謝党，是党給的呀！要不，連咱哥俩也許早不在这个世界上啦。”

哥哥听了也說：“就是，就是！把咱们的苦情跟孩子們念叨念叨，叫他們永远記住祖祖輩輩的苦！永远高举革命的紅旗！”我哥哥一扭臉，牵住孩子們的手，一段一段地向孩子們讲开了。

(夏 曙 整理)

地獄天堂 两个人間

北洋紗厂工人 刘德富

到一九六四年，我整整活了六十个年头。

六十年，我亲身经历了三个社会制度，从地獄到天堂，换了两个人間。

人們爱說黃連苦，我看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，比黃連还苦。

人們爱說蜂蜜甜，我看新社会劳动人民的幸福，比蜂蜜还甜。

誰要不信啊！請听听我的家史。

一笔閻王債

我的老家在河南省湯阴县黃甫村。全家共六口人：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两个姐姐和我。爹成年累月地給外村地主吳老耗做长工。如牛似馬地干上一年，才掙回两石粮食。两石粮，三百二十斤，还不够一个棒小伙子吃的，更談不到填飽家里五口人的肚皮了。没办法，娘只好在家里紡点线卖，哥哥出去打短工，我和两个姐姐到外面拾点柴禾、挖些野菜，一家人風里来、雨里去，才勉强不致于餓死。

哪知，就这样艰难的日子，万恶的剥削阶级也不让我们过下去。这一年，地主吴老耗看我爹老了，干活顶不上一头牲口使，就对我爹说：“干了一辈子啦，也该回家歇歇了！”就这样，爹被赶了出来。

爹半句话也没有说出来，眼睛直怔怔的，憋屈着一肚子闷气，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，一头栽在炕上。

家里的生活更艰难了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本村地主王佩兰，打发狗腿子又成天逼着要债。

这是什么债啊？说起来真是有冤无处诉！

王佩兰是村里有名的恶霸地主，绰号“二县主”。有一年，我家的一个本族要卖地。王佩兰很想买。但村里有个老规章：谁家卖地得先尽着本族要，不能卖给外姓人家。王佩兰不能公开伸进手去，就想了一条毒计，他打发狗腿子找到我爹：

“那地你要不要？”

“肚子都哄弄不饱，哪有钱置地？！”爹摇了摇头。

“俺东家先借给你，往后有了再慢慢还！”

我爹是个老实人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就动了心。结果使了王佩兰五十吊钱，置了九亩地。谁知从此却种下了祸根。

我家几辈儿都是扛活出身，除去两只肩膀扛个脑袋，什么牲口、农具都没有，怎么能摆弄好那地，再加上是块洼地，头一年就叫水给淹了，弄了个颗粒不收。

秋后，王佩兰就打发狗腿子来讨债。这时，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，哪有钱还债？爹好说歹说，算是订规好将本

利折变成粮，轉年春天再将粮折变成錢还債。

那年头，粮价随着季节变。秋后錢折粮，正是新粮上市粮价落的时候；春天粮折錢，正是粮食青黄不接漲价最猛的时候。这笔債拖了不到两年，錢折粮、粮折錢、来回倒騰，再加上驴打滾的利錢，五十吊就变成了一百吊。我爹叹了口气，对娘說：“穷人哪有置地的命！卖地还債吧，要不全家非死在这九亩地上不可！”可是，当爹看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經晚了。

王佩兰一听爹張罗着卖地，便打发狗腿子来，說他要买。不过，要把地卖給他，却要違犯“族規”。于是，他便帮我爹想了个主意：“你要高点价，每亩卖它七吊錢，看有誰买？”本来地价每亩五吊錢，如今誰肯出七吊啊，結果只有把地全卖給王佩兰，这样除还債外，还淨欠他三十七吊錢，他还說这是对爹的“恩典”哩！以后，这三十七吊錢，錢、粮、本、利来回折騰，成了我爹一辈子还不清的閻王債……

爹被地主吳老耗撵了回来，全家生活都成了問題，又哪里能还得起債啊？爹連愁帶急，一場病就送了命。

爹死的那天是正月十五，地主家正大魚大肉过节哩，可怜我家鍋里有的只是烂菜粥。爹临死前要討块饅饅吃，娘含着眼泪找邻舍討来了半碗米粥。爹看了看，把碗一推，双手抓着肚皮，两眼望着屋頂，嗚哩嗚塗說了句：“地主……財主好狠心哪！……”話沒說完就断了气。

两个姐姐的死

爹被逼死后，地主王佩兰讨债讨的更紧了。娘一个劲地央求，他一个劲地不饶，后来他看我家四壁空空，蕎麦皮里实在榨不出油来，就朝我大姐身上打主意。

大姐那年十九岁。有一次，地主对我娘说：“你大姐也不小啦！不能守着干粮挨饿啊！”娘一听，知道他这是逼着卖人哪，哭的上气不接下气。

当时，确实也没个活路了，除去逼命的阎王债，全家几天没吃上一粒粮食了。不能眼看着一家人活活饿死啊！娘心一横，十吊钱就把大姐给了买主。这十吊钱，千乞百求，地主王佩兰拿走了一半，剩下五吊钱，娘买了一石小米。

为了让这一石小米，多延续几天全家人的生命，一天两顿烂菜粥，娘至多放五、六两米。那时我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有一次背着娘往锅多放了两把米，娘发现后马上把手伸到热锅里往外捞。

一石小米很快就吃光了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！娘白天像失了魂，痴呆呆地不说一句话；夜里又像着了魔，翻来复去乱折饼儿。一天晚上，她把二姐拉在跟前，左瞅瞅右摸摸，一把搂在怀里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孩儿呀！不是娘不疼你，可眼下你得找条活路了！”我一听，心里猛的一颤，知道娘又要卖二姐了。

那年二姐才十四岁，整天缺吃没喝，瘦得光剩个骨头

架，誰家都不肯要，东打听，西張罗，最后六吊錢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。

两个姐姐进了人家門之后，整天除了给人家做飯、洗衣、推碾、搗米，还得当人家的“出气筒”，每天公婆罵、丈夫打，干的牲口活、吃不上牲口飯。人家說，这号人打死沒乱儿，死了再討个强的。因此，短短一年的工夫，两个姐姐都被折磨死了！

两个姐姐离家后，哥哥也被生活所迫，跑到彰德府，自求生路去了。

七年徒工苦

全家人死的死、走的走，这时就剩下娘和我两个人了。娘给人家紡綫，我拾柴禾，娘儿俩虽然整天手脚不停，但吃的还是猪不吃的烂菜粥，住的还是狗不呆的破茅棚。就这样半人半畜的生活，熬了二、三年，我十二岁时，家里日子实在挨不过去了。一天，娘跟我說：“你也到城里找条活路去吧！这样下去你就完了！”

哥哥那时在彰德府一家杂货鋪做飯，鋪子掌柜的儿子在彰德府光緒紗厂当“先生”。哥哥托了个人情，說了些好話，把我荐到紗厂当徒工。

开头我心想，进了工厂总比踩在地主脚底下强一些吧！但干了沒几天，这个幻想就完全破灭了！

紗厂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。正式工人一天挣十几个錢，学徒工，一天只挣七个錢。除去飯錢，只剩一个

錢，剛够买个燒餅。

工人們的飯食，一天兩稀一干。稀的，名義是米粥，實際上只有在碗底上才能找見几顆米粒儿；干的，名義上是每人一個十兩重的高粱饅饅，實際上不過六兩重，還摻上一半麸子皮。

資本家怕工人吃飯耽誤干活，除早晚兩頓稀的可以進飯房吃，中間一頓干的是送進車間，邊干活邊吃飯。

飯房是一間黑格隆洞的大屋子，中間一溜儿排着七、八口大缸，一半埋在地下，一半露在上邊，活像個豬食槽。那缸，成年半輩子也沒人刷洗，上頓剩下了，下頓又續上，塵土、米虫子、谷皮，飄滿一層，一年四季也喝不上一頓新鮮粥。

就是這樣的粥，也難得吃上哩！飯房差一分鐘不開門，等門一開放，兩千多人一擁而上，擠在後邊的，常常還沒等盛上粥就上班了。

工人住的宿舍，是十來丈長、五六丈寬的大通間，每個通間要擠滿四百人。屋子沒有窗戶，只有對開着的兩扇門，夏天悶死人，冬天凍死人。

睡覺的時候，洋灰地上鋪的是爛草破席，枕的是磚頭瓦塊，誰要有條破棉帘子蓋，就算“財主”了。我進廠幾年，一直是渾身打渾身。冬天，大家得抱成團睡；夏天，熱得人喘不出氣，醒後滿身是壓死臭虫的血印子。

提起車間，簡直是地道的監獄。每天一進車間，門馬上就上了鎖，不到吃飯和下班的時候，甯想出來。原因是

怕工人跑廁所耽誤干活。生产時間資本家还不准喝水。夏天，天气越悶热，还越往車間放暖气。說怕棉紗反潮、机器生鏽。至于工人是死是活，他就不管了，反正穷人有的是。

工头打罵工人又凶又狠。我們这些学徒工，挨“头儿”的巴掌、鞭子，更是家常便飯，經常是旧伤未愈，新伤又起。有一次我拾管，有两根滾落到机器底下沒看見，“头儿”便掄起鞭子，朝我背上狠抽，虽然隔着一层衣服，还硬是让鞭稍子抽出血来。至今四十多年，还留着这块疤痕。

就在这座人間地獄里，我咬牙渡过了七年。七年，擱在今天，該是个像样的师傅了，可那年头，我仍然是个拾管做清洁的学徒工。

七年辛酸苦

在我干到七年头上，听說天津有个北洋紗厂招工，并說那里吃的飽，住的好，掙錢也多。我一听，赶忙偷着跑回家跟娘商量，娘不让去；又找哥哥研究，他也不让去，都說：“富行千里都吃肉，穷走哪里都受欺”；让我死去那股子心。但我总不死心，总想到天津闖一闖。

一天晚上，我下定最后决心，带着仅有的两件破衣服，揣着百十个錢，奔了火車站。一打听，去天津的路費就得十几块錢，我这百十个錢，还不够坐两站車的呢。可是既然出来了，就不能再回去了，我便偷偷地扒上了火車。怕叫铁路警看見，上去下来都得在夜里。有时遇到查得太

严，就得整天整宵蹲在車站四周洼地里瞅机会。餓了，不管是車站里的瓜果皮子，还是洼地里的野菜根子，都往肚里塞。就这样，用了十三天的時間，才算到了天津。

到天津后，碰巧遇見了在北洋紗厂做工的同乡李金台。他听我說明来意后，苦笑着对我說，这里不但和光緒紗厂一样，还多着两条：一是罰錢；二是开除！我一听，心里往外冒凉气。这真是离开豹子窩，又进了虎狼圈！

好不容易投到这里，想再回去也沒門了，眼前哪怕是个火坑，也只得往里跳。經過工友們操持，总算在北洋上了工，照旧干拾管、扫地的小工活，一天工資三毛三，一月除了吃，剛够买双鞋穿。

在北洋干了一年，听說到裕源紗厂可以学看車，便又进了裕源。誰知来这干了一年，还是拾管、扫地。有个老乡跟我說：“你要不給当头儿的送点礼，干一辈子也是三毛三。”“送多少礼呢？”我忙問。“十块钱。”天哪！我一个月才掙这些錢，送給他，我还活不活呢？

为了以后多掙俩錢，我把工厂伙食退了，自己对付着一天吃一頓飯，想从三个月的苦熬中，省出十块送礼錢。可是，那时一天得干十二个小时的活，肚里沒食哪頂得住啊！沒过两个月，就把我餓得頂不住个儿了。工友們看我餓得皮包骨，都很难受，后来大家商量着給我湊足了十块钱，这才給头儿送上了礼。

果然灵驗，沒过几天，头儿便跟我說：“甭扫地拾管了，学看車去吧！”随着，工資由三毛三，长到了看車的基本工

資四毛四。

开头，我还以为这样就可以下去了。哪知后来工头过生日，别人随了礼，我欠下工友们的钱还没还清呢，便没有送礼，没几天工头就找碴报复了。有一次，我上厕所关了会儿车，就罚我半天工。和他讲理，他瞪起眼珠冲我说：“你小子拣完便宜就不认人啦！罚你是好的，不服气就开除！”从那以后，他接二连三地找碴罚我，一罚不是半天工，就是十个钱，到关钱的时候一算账，跟没长工钱一样。

我气得真想不干了，但是不在这里干，又到哪儿去呢？我只好忍气吞声，又在这里度过辛酸的七年，直到这个厂子“黄”了，才又回到北洋纱厂，继续过着苦难的日子。

八年奴隶罪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日本鬼子占领了天津。我心说，去他妈的吧！饿死也不给鬼子干活。于是我便离开了工厂。

这时，我已经是四口之家了：母亲、老伴、孩子和我；哥哥还在家乡，自谋生活。我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，开头是扛河坝、打短工，后来被逼得没辙，就拉上了洋车。

拉洋车，在那个社会里是一种什么行道呢？不但成年吃大苦、受大累，给有钱人当牲口使，并且天天还得提心吊胆，不知什么时候会飞来横祸，把小命丢在日本鬼子和汉奸警察手里。有一次，我在杨庄摆渡口拉车等座儿，忽然来了几个扛枪的日本鬼子。他们把周围一卡，挨个盘问

日本話。問到我的時候，我說：“我是中國人，不懂外國話！”他操起刺刀背就朝我脖子上砍，一邊砍一邊吼叫：“什麼中國、外國的，統統都是日本的！”當時要不是家老小拉扯着我不能淨身兒，我就和這群豺狼拼了。

還有一次，差一點被他們活活折磨死。那天，我正在小白樓拉座，碰上個日本鬼子，他往車上一坐，伸手朝南一指，說：“快快的！”我一口气拉到陳塘莊，他仍舊瞪着眼吼叫：“巴格牙路，快快的！”我忍着氣接着拉。一路上他不是故意前蹬後仰，就是用刀鞘朝我背上亂捅。我肚里本來沒食，再加上這樣折磨，拉到灰堆我就跑不動了。我把車把一放，說不拉了。他一聽，又吼叫起來：“不拉，死了死了的！”我只得再抄起車把，可是沒走幾步，一個趔趄栽在地上，把他摔了個狗吃屎。他打我，踢我，可我已不省人事了。天黑的時候，我才蘇醒過來，勉強用一隻手架着車把，半夜蹭到了家，躺在炕上兩天不能動彈。

那年頭，窮人越怕出事，奇災橫禍越是纏住你不放。在挨日本鬼子打的第三天，我帶着一身傷，勉強出去拉車時，又被警察揪住了。他說我違犯了交通規則，想向我訛錢。我沒錢給他，就把我帶到警察署押了一天。到晚上，他拔下車上的兩個氣門芯，朝房上一扔，才放了我。我又氣又餓，好不容易拉着車回到家門口，迎面就見孩子哭着向我奔來：“爹！奶奶死了！”我一聽，兩隻腿就軟了，進屋一看，娘直挺挺地倒在炕上。看到這個情景，我就覺得眼前一黑，啥事也不知道了。等我蘇醒過來，心里就像壓了

块鋼板，想哭也哭不出声来。这时才听邻居們說：我出車走后，老伴跟孩子也出去拣煤荳了。娘一个人坐在炉子边等我們。肚里沒食，一下叫煤气熏了过去。等老伴回家，已經沒救了。

娘死后，老伴連惊吓帶愁悶，紧跟着得了一場夹气伤寒。老伴还躺在炕上，从老家又傳来了凶信：說在一次日本鬼子进村扫蕩中，哥哥沒有来得及避开，當場被鬼子活活挑死了！

几天的工夫，死了两口，病倒一口，家里除去光秃秃的土炕，剩下的只是一屁股两肋骨的賬。当时我心想，人要活到这个地步，不如死了痛快。我整天胡思乱想：是上吊？跳河？还是吃耗子药？老伴看我神色不对，叫孩子整天在我后边盯着。看着老伴和孩子这种可怜的样子，我心軟了。于是我轉念一想，倒要看看这个吃人的世道，能把穷人弄到什么地步。就这样，我坚持熬过了日本統治时期的八年奴隶生活，熬过了国民党統治时期的三年黑暗岁月。

万紫千紅时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，天津解放了，籠罩在穷人头上几千年的烏云，被扫得一干二淨。我和全市劳动人民一样，永远脫离了苦海，见到了太阳。

我回到了北洋紗厂。一天，党委书记把我們一些老工人找了去，向我們讲述了革命道理，研究搞好生产的办法，告訴我們工人已經是企业的主人，要我們在生产中發揮帶

头作用。不久，領導上又要我担任前紡車間的生产大組长，負責粗紗鋼絲、清花一大攤子工作。当我想到我这个在旧社会任凭資本家和工头欺压和侮辱的“奴隶”，如今竟然成了企业的主人，并担負了領導工作，激动得热泪滾滾。

同样，在生活上也和全市劳动人民一样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旧社会，一家人成年累月地缺吃少穿，住的房子还不如有钱人家的狗窩；解放后，全家人不仅吃穿不愁，还住上了楼房。旧社会，逼得我全家人，有五口人遭到惨死。現在，加上老伴、儿子、儿媳妇，四个孙女、孙子，已經成了八口人的家庭了。儿子在旧社会跟我受苦受罪，沒念两年小学，就进工厂学徒了，現在經過党的培养，成了工程师。孙女和孙子，凡是到了上学的年齡，都进了学校。甚至连我这个大字不識的老粗，經過几年的业余文化学习，不但識了字，并且能够看文件，讀报纸了。

这些像梦一样的变化，时常向我提出一个问题：刘德富啊，刘德富！你这个旧社会的穷光旦，怎么会有今天？开头，我只认为是穷人赶上了好年代，遇見了救命星；后来經過党的教育和不断学习，才逐渐懂得了：这是由于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，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；由于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，才搬倒了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，換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。要是沒有这些，我刘德富甭說翻身，恐怕早就变成一堆烂泥了！随着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，我的生活志向愈来愈加明确。一九五二年，党的生日那天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决心把自己的一生，

獻給黨的革命事業。

說到這里，我的家史也可以結束了。說也奇怪，舊社會窮人過上一天，真比過上一年還要長；可解放後，覺得還沒有怎麼工作，就增添了十幾歲。我今年已經六十了，有人勸我說：“你這大年紀了，又不愁吃、不愁穿，該退休回家過個幸福的晚年了。”但我想：為了加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，我還要和年輕小伙子們一起，并肩戰鬥到底呢！

（劉道華 整理）

三代人的血泪

电子仪器厂 刘晓珍

“旧社会，好比是，黑格洞洞的枯井万丈深，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，妇女在最底层……”前几年，这首歌在我们工人中间很流行，年长一些的女工姐妹们，唱着这首歌，想起旧社会的苦，就掉下眼泪。这首歌的歌词，说得太对了，要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人们闹革命，咱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在旧社会里，我们一家老少三辈，就有四口人被活活折磨死了！我们一家的惨痛生活遭遇，正是旧社会千千万万个穷苦家庭的一个写照。

我的老家是河北省河间县后洋店村，当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，爷爷、奶奶就过着无法糊口的生活。一家六口人，父亲最大，才十岁，下边有两个叔叔，一个姑姑，全家只有两亩半碱地，一年到头打不了两斗粮食。没办法，爷爷就到韩村一个大财主家扛活，奶奶在家里带着一帮孩子要饭吃。

奶奶是个好强的人，讨吃要喝，怎么也张不开嘴，有时拉着孩子们，在人家门口站上半天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

就又到第二家去要。两个最小的叔叔，饿得实在受不住，就扑在奶奶怀里哭起来，奶奶擦着孩子的眼泪说：“好孩子，别哭，你爹出去挣钱了，等爹回来，咱就好了。”

父亲问奶奶：“爹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过年的时候回来。”奶奶说，“爹回来了，咱包饺子吃。”

从此，父亲就整天掰着手指头算什么时候过年，盼望着年快点来，好吃顿饱饭。

一直盼到腊月，还没有爷爷的消息。奶奶心想：谁是财主家里活忙，腾不出身来。后来村里出去扛活的人们都陆续回来了，奶奶就有点沉不住气了。腊月二十三这天一清早，奶奶就带着一帮孩子坐在村沿上等爷爷，一直等到天黑，也没见爷爷的影儿。

是不是爷爷不想家呢？不是。当奶奶他们坐在村沿上的时候，爷爷正和一个姓齐的伙计一起来到韩财主的上房算工钱，要回家过年。

姓韩的财主正在上房围着火炉喝茶哩，他看见两个长工来找他，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个八九，可是他故意瞪着眼问：

“快过年了，你们不去干活，跑来干什么？”

“活都忙完了，前后院也都打扫了，牲口的草料也备足了。”齐头说，“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东家放我们几天假，我们也回家过个年。”

“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！”韩财主冷笑着说，“今年过年我

要敬神祭祖，杀猪宰羊，接送宾朋，你们的活还多着呢！”

爷爷一听财主不让回家，就火了，他压住气问：“那我们这一年的工钱也该算算了！”

韩财主问：“什么工钱？”

齐头知道爷爷是个火爆性子，这时他赶紧插话说：“东家，我们整整给你干了一年了。”

“这一年，你们几个没少吃我的粮食！”韩财主拿出账本说，“除了饭钱，你们还穿了我的衣裳呢！”

爷爷说：“东家，我可就穿了 you 一条破裤子、一双破鞋，可你当时并没说过要扣工钱！”

“这还用说吗？破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！”韩财主把桌子一拍，恶狠狠地说，“明年老老实实地给我干，到了年底再提工钱！”

雇工不开工钱，这不是骑着脖子拉屎吗！爷爷忍不住，还要跟韩财主讲理，可是被齐头擋住了，齐头冲着爷爷使了个眼色，把爷爷拉出了上房。

爷爷和齐头回到长工们住的屋子，慢慢地商量如何对付韩财主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长工们都睡着了，只有爷爷和齐头憋着一肚子气，在说话儿。忽然听见一阵狗咬，接着是韩财主大声骂起来：

“都睡死了，还不快给我滚起来上房看看去！”

那时的长工，除了白天干活，夜里还得替东家打更护院。当爷爷和齐头起来时，韩财主已经骂得不耐烦了。姓

韓的財主，聽到一點動靜，怎麼這麼着急呢？因為他家是這一帶最大的財主，一到年節，他就格外小心，生怕有人暗算他。

爷爷平常就是財主的眼中釘，如今剛剛和他算了賬，現在又起遲了，韓財主當然不依不饒，指着爷爷的鼻子大罵。爷爷是條硬漢子，寧折不屈，就和韓財主吵了起來。這樣一來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氣得狗財主全身發抖。

為了拔掉爷爷這根眼中釘，韓財主就決心乘機對爷爷暗下毒手。當爷爷和齊頭剛爬上房頂，就聽身後砰的一槍，把爷爷打了下來。

齊頭一見爷爷被打死了，明知是遭了財主的暗算，就忙托人連夜給奶奶捎了個信。奶奶和一幫孩子正盼爷爷回家呢，一聽說爷爷死了，當時都嚇傻了，她把三個小點的孩子留在家里，拉着十歲的父親，一路哭到韓莊。奶奶一進韓財主家的門，見爷爷的尸首還放在院里，槍子打中爷爷的腦袋，他的身子泡在血泊里。

韓財主聽見奶奶的哭聲，才慢吞吞地從上房里走出來。一見奶奶面，就催奶奶趕快把爷爷的屍體弄走，好像爷爷的死，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。他哪知奶奶進門的時候，齊頭已經把爷爷是怎樣被韓財主打死的事兒說了。現在奶奶見韓財主不認賬，就和他吵了起來。

韓財主不光不認賬，反說奶奶誣賴他，就讓人把奶奶推出門去，任憑奶奶在門外哭號，財主的大門再也叫不開了。

“找地方說理去！”奶奶回到家，找当家子們借了几块錢，就拉着父亲去县城告状。那时二叔七岁，大姑三岁，小叔才七个月，正躺在炕上哭哩！奶奶临走时抱起小叔叔喂了几口奶，囑咐二叔說：“妹妹、弟弟餓了，就出去要点給他們吃。”說完拉着父亲走了。

一路上，饥寒交迫，好不容易来到河間县城，找到县衙門，跑过去一喊冤，却被两个挎枪的巡警哄了出来：“臭要飯的还有什么冤屈，快滾蛋！”

这时，旁边一个卖糖的悄悄对奶奶說：“要告状，得先花錢去写呈子。”

奶奶把借来的几块錢写了呈子，递到那两个挎枪的手里，那巡警看也不看一眼，揮揮手說：“回家去等着，儿时过堂再傳你。”

“这是人命血案呀！”奶奶哭着央求那挎枪的巡警，“人还没埋哩，求你們先去驗驗尸吧！”

“別罗嗦，衙門不是朝你开的，快滾！”

奶奶无奈，又带着父亲奔回韓村。当奶奶和父亲来到韓村村边时，忽然看見几只野狗在一边撕咬着什么，奶奶跑过去一看，却是爷爷的尸首。奶奶連气带累，就晕死过去了。

奶奶苏醒过来，呼天喚地地哭了一阵，又拉着父亲要再去河間告状。这时刚刚十岁的父亲哭着，說什么也不走了，他又冷又餓，两条腿冻得粗粗的再也走不动了。

“孩子，人活着得有骨气，你爹死得惨，咱得替他报

仇！”奶奶背着父亲一路讨吃要饭，又来到河间县政府，门口挎枪的巡警还是不让进。正在这时候，韩财主坐着轿车子赶来了，他在县政府门前下了车，将皮袍子上的尘土拍打干净，冲着奶奶冷笑了两声，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过了不大工夫，县政府出来一个人对奶奶说：“你哪里是告状，明明是诬赖好人。快点滚开，以后再敢捣蛋，就把你押起来！”

奶奶一听这话，知道当官的使了韩财主的钱，这官司是不能打了。这时，奶奶不再央告他们，像个木头人似的，又背起父亲返回韩村。在齐头的帮助下，奶奶把爷爷的尸首运回后洋店村，找了块破席，没有进村就把爷爷埋了。

埋了爷爷，奶奶想起了家里的三个孩子，就像疯了似的朝家跑去。一进家门，两个大点的孩子就扑在奶奶怀里哭起来，奶奶一看，七个月的小叔，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已经饿死了。

奶奶这时已经哭不出声来了，她流着眼泪抱起小叔，就像往常哄孩子那样，和孩子说起话来：“孩子，韩财主害得咱家破人亡，咱可得报这个仇啊！”

爷爷一死，一家人的生活更没指望了。没吃的，没穿的，还得归还打官司借的账。“不能让孩子都跟着我冻死饿死！”奶奶一狠心，就把四岁的姑姑卖给一家姓吴的了。

一天，姓吴的来领人了，奶奶把姑姑抱在怀里说：“孩子，跟人家走吧，到了人家就不挨饿了。”四岁的姑姑，这时已经懂事了，她抱着奶奶的脖子哭着不放，父亲和二叔

一見要賣妹妹，就央告奶奶說：“別賣小妹妹，以後我們不吃飯還不行嗎！”還沒待奶奶回話，姓吳的抱起姑姑就走了。

賣了姑姑，錢剛够還賬的，一家三口還是沒吃的。同村有個彭奶奶，她勸奶奶去給一家財主當老媽，好养活兩個孩子。奶奶一聽給財主家干活，心好像翻了個兒，可是不去又沒別的法子，只好勉強答應了。

從此以後，奶奶走進了另一個閻王殿。她在財主家干活，整天挨罵受累，可是為了掙點工錢，還得拼命地干活，剛剛干了兩個月，就瘦得不像人樣了；一天奶奶覺得頭疼的厲害，一交跌倒，就再也爬不起來了。奶奶臨死前，不斷呼喚着父親的小名說：“朝，娘扔下你們走了！你要好好照顧弟弟，別忘給你爹報仇！”快斷氣時，奶奶用手拉着自己的上衣大襟，斷斷續續地央告着身旁的人：“我死了……，千萬把這身破衣裳扒下來，……給我的孩子捎回去……”

奶奶死后，父親和叔叔就把自己賣到一個戲班學戲，整天挨打受氣，過着痛苦的流浪生活。但不管生活怎麼折磨，為爷爷報仇的念頭，一直埋在他們心裡。

這年，父親已經是三十歲的漢子了。一天，他偷偷地從戲班里跑了出來，本想給爷爷報仇，但是從齊頭那兒知道，韓財主已經死了。

齊頭說：“回來了就好。我和你爹如同親兄弟，我把你當成是自己的兒子，以後你就住在我家吧。”後來，老齊頭又把他的女兒嫁給父親，父親帶着娘又回到了后洋店村。

后来，娘一連生了四个孩子，也是个六口之家了。为了生活下去，父亲只得又离开家，到一家戏班去下活，娘在家里領着我們一帮孩子要飯吃。

父亲的嗓子不好，唱不了戏，就在戏班里給人家穿衣裳，一年到头，掙不了几个錢。有一次，父亲跟着戏班在夜間赶路。那是一个冬天，天漆黑，还刮着大風，戏箱由好几辆大車拉着，老板穿得厚厚的坐在大車上，父亲跟着車跑。父亲实在跑不动了，就坐在大車的戏箱上，不想让戏班老板看見了，他二话不說，一脚将父亲踢下車来，車走得正欢，父亲的一条腿当时就被后边的車軋断了！他疼得大呼救命，可是狠心的老板催着車把式，哄起大車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父亲爬到一个小村，住在一家小店里，掙来的几块錢，花尽了，才算保住了一条命，可是人却殘廢了。没办法，父亲又搭上另一家戏班，这回只能干些洗衣、做飯等粗活，掙的錢就更少了。

我們几口留在家里，日子自然更不好过。那时村里除了几戶財主之外，家家都是缺吃少穿，要飯也无門可要了。没办法，娘就让十二岁的大哥哥去帮人扛活，把二哥过继給一个当家子伯伯，娘自己到本村一个姓張的財主家去当奶媽，家中就剩下我和小妹妹，那年我七岁，小妹妹才十一个月。

娘一清早就到張財主家去奶人家的孩子，很晚才回来，我和小妹妹在家餓得哭，娘回来就哄着說：“咱家六

口，出去了三口；只要过了这个年，咱就算熬出来了！”

一提过年，我这个还不大懂事的孩子又是愁又是恨。因为父亲常常给我讲爷爷是怎么死的，我恨过年，恨那些有钱的大财主，恨那个不平的社会。

就在这年冬天，小妹妹病了，浑身滚烫，整天哭。我这个七岁的姐姐就抱起妹妹在土炕上来回走动，哄着，还学着娘的口吻对妹妹说：“别哭了，熬过这个冬天就好了。”妹妹不听我哄，越哄越哭，我没有办法，最后也跟着哭起来！

妹妹的病越来越重，要是有钱人家，早就请医生吃药了，可是娘每天晚上回来只能给妹妹打点高粱面稀糊糊，清早娘照旧嘱咐我一句：“好好看着妹妹。”就又到张财主家上工去了。

这天，小妹妹在我肩上哭了一阵后，慢慢闭上眼睛，我以为她睡着了，就把小妹妹放在土炕上，心里轻快了许多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小妹妹忽然喘开粗气了，翻着白眼珠，两只小手把土炕挖成一个个小坑。我吓坏了，赶紧跑到邻居家叫来了心婊子。

心婊一看就急了，她说：“快叫你娘回来，孩子不行啦！”

我说：“张财主不让娘回来！”

“我去找你娘！”心婊说完就跑到张财主家，把孩子病重的事儿对娘说了。

娘去求财主婆让她回家看看，财主婆把眼一瞪说：“孩

子病了，你回去也不会治病呀！”

心嬌說：“孩子都快死了，让他回去見个面。”

“不行”財主婆說。“我的孩子還沒吃飽呢！”

娘看看財主那又肥又胖的孩子，已經躺在炕上睡着了，又央告財主婆說：“我快去快回，耽誤不了。”

“別廢話，早來晚走這是規矩！”這時張財主也走過來說。“要想回家就別回來了。”

娘不敢再說什麼，把心嬌拉到門外，哭着說：“別讓孩子餓着肚子死，瓦罐里还有一点高粱面，求你給孩子打碗糊糊。”

心嬌抹着眼泪回來了，照着娘說的給小妹妹打了一碗稀稀的高粱面糊糊，碗沿剛剛碰着小妹妹的嘴唇，小妹妹就斷了氣。

这天夜里，刮起了呼呼的西北風，桌上的油灯，被風刮得一明一暗的，我这个七岁的姐姐，望望身旁的小妹妹，摸摸她的身上还有点溫和，心想，也許小妹妹沒有死。和往常一樣，我把自己的破棉袄脫下來給妹妹蓋上，就抱着小妹妹的尸首睡着了。直到后半夜，娘才回來，她抱起小妹妹的尸首一邊哭一邊數落着說：“不是娘心狠不管你，是財主不讓回來呀！”

第二天清早，鄰居們來了，娘還摟着小妹妹的尸体哭哩。心嬌說：“別哭了，想个办法，把孩子埋了吧。”想什么办法呢？我們睡的上炕連領破炕席也沒有，娘只好把破鍋蓋墊（一種用秫秸編的鍋蓋）揭下來，將小妹妹裹起埋

了。

娘一着急，奶水少了，張財主就一脚把娘踢出門來。

过年了，父亲从外边回来了，一身破衣裳，腿也瘸了。娘想起已死的小妹妹，一陣心酸，哭了起来。

“孩子死了，省得他受罪。还是想法保住活着的吧。”父亲强忍住心里的难过，从腰里掏出几块钱說：“过年了，咱家也吃頓餃子！”

父亲买了十斤麦子，剛剛磨成面，張財主就跟着來了。

張財主指着父亲說：“你回来正好，把地租交上吧！”

“什么地租？”

“村北的二亩地不是租給你了！”

父亲想起来了，几年前，有一次張財主对父亲說：“你家境苦，我村北有二亩荒地你种了吧，交不交租沒关系。”父亲到村北一看，是二亩碱荒地，种了一年連种子也收不回来，后来父亲就沒有再种。

“那二亩地不长庄稼，这几年我也沒种。”父亲說，“当初你說过交不交租沒关系。”

財主嘿嘿一笑說：“那是說，只許我不要不許你不給！”

父亲說：“我沒錢交租！”

“沒錢交租，有錢买麦子！”張財主飞起一脚把父亲踢了个跟斗。父亲爬起来，就要跟張財主拼命，却被娘抱住了。娘怕出事，只好把剛剛磨好的面递給張財主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我們家里連一顆粮食粒也沒有，好心的邻居給我們端來了一升豆面，娘把一些晒的山药叶当菜

餡，包了一些餃子，可是煮熟了一看，却是一鍋黑湯！

娘坐在地上，雙手不住地擦着眼，一句話也不說。父親沒等到天亮，把腳一蹶又走了。

正月初四这天，地主的儿媳（是我村的）回娘家拜年，哥哥也跟着回来了。地主的儿媳穿得暖暖和和地坐在轎車里，我哥哥却穿着一身又薄又破的衣裳，在寒風里跟着那头膘肥体壮的大黑驢整整跑了四十里地。哥哥的两只脚本来就长着冻疮，这一跑，疮口裂开了，膿血一齐往外流，疼得钻心。他回到家坐在炕上，耷拉着两条腿，让娘給他脫鞋。膿血和鞋冻在一起了，娘費了好半天勁，才把它脫下来，仔細一看，天哪，哥哥的两只脚已經沒有一块好肉了，哥哥痛得昏了过去。

正月初六那天，哥哥死去了。临死，他还拉着娘的手說：“好娘，別让我去扛活啦！”

我十岁那年，日本鬼子占了河間城。日本鬼子常常下乡燒杀搶掠，人們的生活更苦了。我和娘整天去打柴割草，餓了，就順手挖点野菜吃，那年头，俺娘俩就吃过五种树叶，十一种野菜。我十五岁上，实在混不下去了，娘就把我送到婆家。

到了婆家，日子也不好过，打柴割草，喂猪做飯，整天拼命干活，仍然吃不上一頓飽飯。

一天，天都黑了，我到地里去打禾子（一种喂牲口的飼料）。剛剛下了一場大雨，禾子地周圍都是深深的积水，我过不去，就坐在地边上掉泪。这时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

淌着水走过来。那女的见我哭，就蹲在我跟前问长问短，我把这为难的事儿全说了。那两个男的一听，就说：“小姑娘，甭着急，我们替你去打禾子。”说着又淌着水返回去，不大工夫，替我割了一大捆禾子回来。我长这么大还没碰上过这样的好人，真想說几句感謝的話，可是嘴笨說不出来。这时那个女的悄悄告訴我：“我們是八路軍，你有什么苦处，以后可以找我們說說。”

从此以后，凡是八路軍召集什么会，我都积极参加，苦日子也觉得有了盼头。

一九四四年我十八岁时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，在党的哺育教导下，我慢慢地懂得了受苦受难的不光是我們一家人，和地主阶级有血海深仇的也不光是我們一家人。我們一家三代的仇恨，也正是千千万万劳苦人民的仇恨！我要替惨死的爷爷、奶奶、哥哥、妹妹报仇，更要替千千万万被折磨被压榨的人们报仇！我站得高了，看得远了，行军打仗浑身是劲。经过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，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！

十几年来，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压在我們头上的三座大山，终于让我们推倒了。全国解放后，我一直留在家乡工作，父亲和娘常常到我的工作机关来看望我，父亲在一九五二年病故，去世前还对我說：“孩子，可不能忘記过去啊！”一九六一年我轉到工业部門工作，調到天津电子仪器厂第三車間任党支部书记。現在我和全国广大劳动人民一样，有一个温暖而幸福的家庭。我那在旧

社会饱受苦难的老母亲，现在还很健康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她在新社会的亲身经历，使她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。例如有一年，她从天津坐汽车回家，路上因个人一时不慎，一下被过往的汽车，把伸在窗外的胳膊给碰坏了。血流如注，十分危险。当时汽车便把她送往县立医院，本村青年知道后，都自动赶到医院为她输血。经过抢救医疗，终于化险为夷，平安返回家中。这和旧社会爸爸被大车轧坏大腿的悲惨景象，真是鲜明的对比！因此，一提起这件事，娘便激动地说，“咱们的新社会，真是一人有难，万人相帮，到处都是温暖的家。”

一到了公休日，爱人和孩子们都回家来，一家人就高高兴兴地团圆一天。每当大家热热闹闹地又说又笑的时候，娘就把孩子们拉到跟前，讲述一段过去的苦难，临了嘱咐孩子们说：“你们都是喝甜水长的，可得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好好替国家出力！”

娘说得对，永记住阶级苦，不忘血泪仇！如今每当我们一家人想起过去受折磨的痛苦生活，就越发觉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不易。为了保卫我们的新生活，我们要加倍努力工作，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富强。

（端木青枝 整理）

我的一家

国棉五厂工人 任大海

我任大海本来姓房，为什么改姓任了呢？这要从我家的变化说起。

家破人亡

二十六年前，我家有四口人：父亲、母亲、小妹妹和我。父亲叫房德龄，我叫房大海，在天津市西头大觉庵住。父亲是个花匠，整年给地主卖命，收入很少，一家人饥一顿饱一顿过日子。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强盗占领天津后，常常抓穷苦老百姓去拉练，把拉练的当奴隶使唤，打得他们身上腿上青一块、紫一块。有一天，我和父亲碰见几个鬼子，父亲被他们抓住了。父亲刚要逃跑，便被鬼子猛地一枪托打懵了。我也给吓傻了。等我清醒过来，见鬼子正要把父亲带走，便冲上去，抱住父亲的大腿。谁知鬼子转过身来，就是一脚，将我踢倒在地上，随即就把父亲拉走了。

我跑到家跟母亲一说，母亲就哭喊着向外面奔去。我跟在母亲后面追，小妹妹跟在我后面追。到了出事地点，父

亲早就沒影儿了，母亲瘫在地上哭起来，小妹妹赶来了，坐在母亲腿上也跟着哭。哭了老半天，妹妹說餓了，鬧着要回家，母亲才領着我，抱着小妹妹哭着走回家来。

自从父亲被抓走以后，母亲随时随地都要我和妹妹跟在她身边，生怕再发生什么意外。母亲还常常領着我和妹妹到河边去，希望能够看到父亲。一条船一条船过去了，哪里有父亲的影子？每到这个时候，母亲便急得摟着我和妹妹哭一通。

我家本无隔夜粮，这时父亲被拉走了，一家人的生活就更成問題了。母亲領着我出去借粮食：富人不会借給；穷人哪里有吃的可給？没办法，只得东家凑点麸子，西家抓把高粱面，拌在一起作成餠吃。

母亲心里发愁，經常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，有时深更半夜地哭，泪水常常滴到我和小妹妹的臉上。母亲就是这样領着我們苦熬着，天天盼望着父亲回来，真是把眼睛都盼藍了。

盼呀，盼呀，父亲终于跑回来了。父亲本来就又黄又瘦，經過鬼子一番折磨，衣服破破烂烂，滿臉尘土，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，更不像人样了。母亲不知是高兴，还是难过，依然一个劲儿地哭。父亲摸着我和小妹妹的脑袋，也不住地掉眼泪。

母亲由于受了鬼子抓父亲的惊吓，和父亲走后生活的折磨，在父亲回来沒几天，就病倒了。因沒有錢給母亲治病，急得父亲天天轉。有一天，母亲流着眼泪，对父亲說：

“你回来了，我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，两个孩子交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”接着，把我和小妹妹也叫到炕边说：“你们要听爸爸的话，大海要多照顾妹妹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就咽了气。那时妹妹还不满五岁，看到母亲不睁眼了，叫妈妈也不答应了，便哇哇地哭着，爬到炕上抱着母亲的头拼命摇晃。

母亲死了，埋了，可小妹妹不懂，天天四处找母亲，“妈呀妈呀”地叫得使人心酸。小妹妹这时更听我的话了，哥哥哥哥地叫得特别亲。可是，有一天，突然不见小妹妹了，我急得到处找。正在这时父亲回来了，我胆战心惊地告诉父亲。很奇怪，他一点也没有生我的气，却说：“不要找了，丢不了。”我说：“那她为什么还不回家呢？”父亲把我拉在身边，嘴唇颤抖着说：“孩子，地主说我身体不好，不雇我了，我养不起你们哥俩，把你妹妹给人了。”我一听，痛哭起来，可父亲却像傻子一样，坐在那儿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母亲死了，妹妹给人了，父亲想，剩下两口人，怎么也要活下去，哪知紧接着又遇到了新的灾难。房东怕我们缴不起房租，把我们租的那间房子要回去了。没有房子住，又到什么地方去安身呢？父亲向地主说了不少好话，才让我们爷俩住在他的花窖里，但是父亲得把地主的花照顾好。就这样，地主一不高兴，还骂骂咧咧地要赶我们爷俩滚蛋。

过了一些日子，父亲非常难过地对我说：“大海，这样熬下去难活命啊，你还是找个地方吧！”听了父亲这句话，

我全身都哆嗦起来，怕父亲把我卖了。我问父亲：“到哪里去呢？”父亲说：“去西关救济院吧！听说那里收养孤儿。”我真舍不得离开父亲，这是我唯一的亲人呀，可是，不去怎么办呢？

父亲把我送到了西关救济院。在画押的时候，父亲痛苦得浑身直打哆嗦。画完押，父亲用满含泪水的眼看着我，一声不响。这时，一个鼠头贼眼的家伙对父亲说：“行了，走吧！”

父亲迟钝地转过干瘦的身体，慢慢地走出门去。在他出门之后，才在外面说：“海儿，好好呆着，过些天我来看你！”我心里一阵发酸，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我们爷俩就这样分别了，那时我还不到九岁。

人 間 地 獄

不知道内情的人也许会說：旧社会的救济院是个慈善部門，来这里的人总該能吃飽穿暖吧？！实际上，它却是挂羊头卖狗肉，是一座人間的活地獄！

当时的西关救济院，窗戶上装着铁栏杆，矮墙上布满了铁丝网，大門口还有持枪站崗的。从外表看，就像一座大監獄，叫你害怕、胆寒。

救济院分南院和北院，其中設有老人部、妇女部、青年部和儿童部。在儿童部中光男孩就有二百多人。你想想，在旧社会，有多少劳动人民被統治階級逼得妻离子散，骨肉分离，家破人亡呀！在这座大院里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

集中点罢了，至于流落在街头、农村的，更不知有多少了！

我們两百多个男孩子，住的是几間相連的大屋子，每間屋子里装七、八十个孩子。这些孩子个个瘦的皮包着骨头。一年四季，也不让出大門一步，稍不如这里“老师”和管理人員的意，便要挨打受罵，他們还故意在打人的板子上，钻了一些窟窿，一板落在身上，就出現一条紅印，紅印中間有很多紫斑。这样的板子打人疼得钻心，可多疼也不敢哭，哭就往死里打，多会儿打得不哭了算完事。

他們当然不会白养活我們，整天要我們做毛刷和繩。鬼子要得急，管理員就監督我們拼命干。我們人小，气力不足，常常完不成任务，完不成任务就得挨打，打完了还得接着干。每天从早到晚，累得我們骨头縫里生痛。

整天整年的干，但吃的什么呢？开头每人每天五个小窩窩头、一点臭咸菜、一碗白菜湯；以后就天天吃山芋干、豆餅和果仁餅，弄得人人都鬧胃疼病。有的疼得在鋪上打滾。管理員看見了，还破口大罵：“飽飯撐的，不少吃一点，撐死活該！”

我不但常鬧肚子疼，还常鬧眼病，眼珠上布滿了血絲，像針扎着一樣难受，眼皮也肿了，紅肿得像小桃。一早起来，眵目糊粘得眼皮睜不开，常常把眼毛粘掉。我現在眼毛少，就是那时鬧眼鬧的。

打从一鬧眼病，我就更想念父亲了。哪个人家里来了亲人看望他，我就站得远远地看着，心里又羡慕、又难受。一旦叫管理員看見，又是一頓打罵：

“滾，快干活去！死光了就不会来，沒死光总会有人来，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我实在太想念父亲了，就扒着窗口向外看，希望父亲来看看我。窗口很高，我就搬張桌子，在桌子上搭个小椅子，站在小椅子上向外望。有时被管理員看見了，一脚把小椅子踢翻，就要滾下来。但是，摔也好、打也好，一有机会，我还要扒着窗口向外看。有时看到一个像父亲模样的人从馬路上走过，我几乎就要喊出爸爸来。

父亲終于来了。他更瘦了，声音也更沙哑，精神也更不好了。我看到他，又高兴又难受。管理員站在旁边，我不敢把在这里挨打受罵的情况告訴他，父亲也难过得說不出話来！爷俩只是默默无語地面对面站着。

过了一会，管理員就不耐煩了。

“走，到時間了！”

父亲緩慢地伸出两只柴棒似的手，一只撫摸着我的干瘦的臉，另一只拉着我的手，我急促地喊着“爸爸、爸爸”。我真希望父亲多呆一会儿，更希望和父亲永远也不分离。可是，管理員又叫嚷起来，催逼着父亲立时离开这里。

我們爷俩只好抹着泪分別了。我看着父亲的背影，心里說：“将来出了救济院，掙了錢，一定好好地养着他老人家，让他过几天舒坦日子。”

父亲走了以后，我的心也像被带走了一样，更感到这里的生活，不是人过的。进院时发的一床破棉被，一年四季都是它，髒了没人洗，破了没人补，盖来盖去，破得像

烂牛肉一样。到了冬天，屋里炉子小，身上衣服穿的少，北风嗖嗖地一吹，冻得人牙齿老打架，咯吱咯吱地响。

身上穿得虽然少，但虱子却很多，哪里痒痒，一摸就可以捉到几个。因为常年不洗澡，皮肉脏，虱子一咬，抓破了皮就长疥。手上脚上长得特别多，衣服一蹭就钻心痛。没办法，只好挤，挤得手上脚上血糊糊的，血水流到哪里，就烂到那里，肉皮好像纸糊的，一撕就是一大片。脓疱疥长得太多了，站着坐着都痛，躺着就更痛了。现在每次洗脚，看到脚上的疤痕，就想起那段痛苦的经历。

到了夏天，蚊子成群，臭虫成堆，满屋子汗臭。站着、坐着蚊子叮你，躺下臭虫咬你。早晨起来，身上都是红疙瘩。

我在救济院就这样苦熬了整整七年，再也不愿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了。心里想，到外面跟父亲一起，好好干活，凭力气挣碗饭吃，再苦总比在这里好。于是，我和几个同伴结成一条心，闹着要出去。人多力量大，他们怕惊动更多的人闹出院，就把我们几个撵出来了。

一踏出救济院的大门，回想起父亲送我来的情景，和几年来的人间地狱生活，不禁掉下泪来，我心里叨念着：

“救济院呀，救济院，名字多慈善，老虎披羊皮，豺狼心肠菩萨脸。”

老少四姓

我从救济院出来，就去找父亲。也许是高兴吧，步子

走得快极了。走一阵，跑一阵，恨不得马上看到父亲。我到了原来住的地方一看，一些穷苦的老邻居一个也没有了。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还不是和我家一样，死的死、送人的送人，东逃西散，家破人亡了。

我左打听，右打听，都没有人知道父亲的下落。他哪里去了呢？活着，又在哪儿？死了，又埋在何处？一直到今天，也没有找到下落。

当时我找不到父亲，急得头晕眼花，两条腿像没有骨头一样，一下歪倒在地上，抱头大哭起来。

我晕头晕脑地在大街上走着。没有家，没有亲人。听说世上黄连最苦，我看孤儿比黄连还要苦三分。走着走着，灯亮了，来来往往的人少了。我累了，靠着店铺门槛坐着；起初还听见里面算盘响，慢慢地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这时，只见鬼子、地主的凶相，母亲、妹妹的眼泪，父亲的瘦弱身影，以及救济院“老师”和管理员的板子、棍子，接连不断地在我眼前出现。我给惊醒了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爬起来，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。

“要有工作就好了，只要比在救济院好一点就行。”我这样想着。

后来我真的找到了工作，进了双喜纱厂，天天抬煤渣，受大累。我怕丢了工作，豁出命来干。但工头不是嫌我动作慢，就是嫌我抬的少，怎么看我也不顺眼。

干完一天活，骨头都要散了。往大工房的炕上一躺，全身火烧火燎的。住在大工房，和住在救济院一样，四十

来个人住一間屋子，滿炕破褥爛被，蚊子臭虫有的是。

大家見我年輕，身子骨又不結实，都很关心。其中最关心我的要算任大爷了。他五十多岁，总是不声不响的。我和他合盖着一床破被子，鋪着一條褥，这些都是他的。当他知道我的遭遇时，很是激动。他也是个苦命人，从小就凭力气挣飯吃，在裕大和双喜两个紗厂抬了二十来年的煤，沒有挣下一分錢。过去結过两次婚，由于自己吃穿还顾不过来，哪能养活别人呢，結果都散了。如何結束他的一生，他不敢多想，他虽然看透了那个鬼世界，可是有一肚子苦水沒处倒，就常和我說說心里話儿。

晚上，他撫摸着压破了皮的肩膀，又給我盖得严严实实的。白天碰在一起，他总是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，使我感到亲切，心里想：他和我父亲一个脾性。

干很累的活，每頓只給三个窩窩头，工人们总是空着半个肚子。我怕丢了工作，还是咬着牙干。有工作总比沒有工作强，不管受多少罪，总可吃上三个窩窩头。可是工头連这三个窩窩头也不让我吃，还是把我开除了。

我想哭又哭不出来，想走又沒有地方可去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門。我今后怎么活呀？

“大海，別难过。”一只大手落在我的肩上，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任大爷站在我身边。我不禁伤心得大哭起来。任大爷一面安慰我，一面大罵工头。

过了些日子，有个工友对我說：“小房，还是和任大爷搬到一起住吧。他沒有儿子，你沒有了爹，湊在一起，

不正好是爷俩吗？”我心里乐意，可是觉得害羞。“大爷、大爷”地叫惯了，要改口叫爸爸，多不好意思呀，我没有吭声。

“不吱声，就算同意了。”他又去问任大爷，任大爷早就有这个心思，就乐呵呵地答应了。

从那天起，我就改姓任，名字仍叫大海。

父亲养不起我，爷俩商量了半天，决定卖烧饼馃子糊口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我打心眼里高兴，认为这回可有出头的日子了。可是我的希望像小孩吹的泡泡一样，马上就完蛋了。国民党反动派又把美国狼引进中国，穷人更遭殃了。所以，我照样失业，照样卖烧饼馃子。

我天天起得很早，回来得又晚，连饿带累，两条腿瘦得像麻杆一样。人们见了都很难过，就对父亲说：“老任头，反正是苦，不如找个老伴，好关照关照大海吃穿，别把孩子折磨坏了。”父亲怕我不同意，琢磨来琢磨去，拿不定主意。人家又跟我说，我想：父亲年纪大了，万一有个病灾，也要人侍候，他有了人服侍，我也就可以安心谋生了。便说：“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像亲妈一样对待她。”

于是，父亲找了个老伴，还带来了一个妹妹。妹妹原来姓李，也是母亲从穷人家抱来的，和我进救济院时的年岁一样，还不到九岁。我们老少四个，受尽苦难，尝尽辛酸，如今凑在一起，成了一家人。

两口子过日子，生活就够苦的，现在又增加了两口子，就苦上加苦，真是黄连树上挂猪胆，从根到梢都苦透

了。好在我們都是苦蔓上結的瓜，互相體貼，雖然不是親兒親女，不是親爹親媽，但也是真正的一家人。

鄰居們看到我們和和睦睦地過日子，都很高興；但看到經常揭不開鍋蓋，也很擔心，怕日子一長，就要散伙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都沒有好下場。我也怕家散了，也成天吊着一顆心。

窮哥們決心救我們一家人，又保薦我進了工廠。雖然爺倆都有了工作，可是生活並沒有好多少。每月票子關了半面口袋，却買不到一口袋糧食。下了班，爺倆只好去打個雜工，能掙多少算多少。

母親是個既能吃苦又很勤勞的女人，雖然五十來歲了，卻想盡辦法把我們的窮日子安排好。幾件破衣服，縫補得平平整整，漿洗得干乾淨淨，布鞋做得結結實實。吃飯時，把干的端給我們爺倆吃，等我們爺倆上班去了，娘倆才喝碗湯湯水水。妹妹也真是個難得的好孩子，幫着母親干這干那，看別人吃好的不羨慕，看別人穿花衣不眼饞，她也懂得，窮家就靠苦撐。

我們四個人就這樣生活在一起，老的關懷小的，小的敬愛老的，大家咬着牙，挺着腰板，經受着舊社會的折磨。這種出自於階級的情誼，把我們緊緊地團在一起，終於克服了種種苦難，熬到了解放前夕。

不 忘 革 命

天津解放了。壓在咱勞動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

了。从此，我一家四人，都脱离了苦海，见到了青天。全家老少都从心里感到，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，才能给咱劳动人民带来幸福，才是咱们最好的带路人。

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，我们的生活不但越过越美好，而且政治觉悟也不断地得到提高。像我那已退休的老父亲，现在已经是七十二岁了，但他有一颗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心，谁也无法把他关在家里。每天，天蒙蒙亮，他就起床到工厂去，和几位退休老工人一起，把工厂的里里外外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还常对青年们说：“劳动是劳动人民的本色，不劳动还能叫劳动人民吗？”他知道，党为咱们指出的美好理想，是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才能实现的。因为他思想开朗，精神愉快，所以打从解放，身子骨一直很结实，整天喜笑眉开，再找不到一丝愁纹。全厂同志都叫他“老乐观”。

母亲也七十出头了。别看她平时很少出门，但革命道理却懂得不少。她知道，每个家庭要过得好，首先得国家富强；要使国家富强，光靠劳动还不行，还要人人节约，户户勤俭持家。所以从解放到现在，我家的生活虽然一年比一年富裕，但母亲在操持家务上，一直是精打细算，一点也不铺张浪费。

我的妹子现在也已长大成人了。一九六二年，她和公社汽车修配厂里的一个钳工结了婚。婚后和婆婆住在一起，已有了一个小孩，如今也有了个四口之家了。不过，他们这个家，是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建立起来的，与我原来的

家，与她原来的家，与我們解放前湊成的家，真是一天一地！因此妹妹常常說：“沒有共产党、毛主席，也就沒有我这个幸福的家庭。”

我个人在党的教育下，觉悟也不断提高。在解放后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中，使我逐渐认清了资产阶级的罪恶本质和腐朽面目，认清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。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，在生活中不应光想到自己的小家庭，应首先想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。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江山坐稳了，事业发展了，每个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，才可能得到可靠的保证。要是让那些吃人的野兽再重新爬起来，我们就必然要回到更加可怕的苦难生活里。

由于懂得了这个道理，我便积极争取参加各项政治活动，干活时的劲头也大了，遇到困难，受到波折，也不泄气了。一九五三年我入党后，便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事业。

现在，我又觉得，不但自己要革命一辈子，还必须教育好自己的后代，要他们代代都能革命一辈子。因为他们都出生在新社会，不知道什么叫苦，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。这样下去，必然会忘掉阶级、忘掉革命。像我那已上学的三个大孩子，当他们学校里开展阶级教育的时候，他们便回来问我：“爸爸，旧社会的地主、资本家真是那样凶狠吗？”为了回答他们的问题，我便把我们家的变化情况，向他们讲了一遍。起初，小家伙们都愣了；过几天，他们放学回来，不但主动帮爷爷奶奶干活了，吃饭穿衣也

不挑挑拣拣了。他们开始懂得，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要想过更加幸福的日子，还得更要艰苦奋斗。另外，我还告诉他们：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，还在过着像我们过去那样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的生活，我们要帮助他们早日争得解放，使他们的儿童也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。

（萧宝琪 整理）

我的身世

天津南站 刘福章

小学一年级课本里有这样一課书：“爷爷七岁去讨飯，爸爸七岁去逃荒，今年我也七岁了，公社送我上学堂。”每当我听到孩子們念这課书的时候，鼻子就发酸，眼泪就禁不住要落下来。这課书，正是說的我們一家人！……旧社会害得我們一家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侥幸沒死的也是四处奔命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。是新社会，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們一家人从火坑里救了出来，使我們有了幸福的今天。我一想起新旧社会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经历，心里就充滿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，对新社会的无限热爱。

父亲的死

一九二四年，我出生在河北省靜海县大庄子村一个雇农家里，父亲給地主刘殿选当长工，一家五口人，还有一个姥姥也跟着我們，穷得连飯都混不上。长工的生活，连牛馬都不如。父亲早晨披着星星下地，晚上頂着月亮回来，夜間就睡在地主的牛棚里。一天累死累活，到夜里还得伺候牲口。一到夏天，牲口棚里的蚊子抱成团，在那儿呆一

宿，得把人咬成个什么样呀！父亲浑身上下，被蚊子咬得沒有一块好肉。一年夏天，父亲脊梁上有一块蚊伤溃烂了。慢慢地，疮口越来越大，后来，連行动都困难了。地主刘殿选不但不許父亲养伤，还逼着父亲去推磨，地主家的磨是牲口拉的大石磨，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忍痛干了两天，疮口就被震裂了，后背肿起三寸多高，就像披了一层厚棉被一样。父亲实在干不了了，就找地主換輕活，刘殿选却瞪着眼罵道：“媽的！干不了就滾！滾！”連踢帶打，就把父亲赶出来了。父亲到家沒几天，疮就从脖子一直烂到后腰，稍微一轉身，膿血就忽忽地往外流。我那时刚懂事，看到这情形，吓得躲在母亲身后不敢看。媽媽眼瞅着爸爸那痛苦的样子，但是又沒錢治，父亲的病，就这么被耽誤了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那是九月十七日夜里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忽然，被一陣哭声吓醒了，我一睜眼，屋里黑古隆洞的嘛也看不见。“福章！福章！快点灯呀！……”母亲的声音都变了。我一下子就慌了，赶紧下地，这才想起来，我們家从来就沒有灯呀！我忙点了一把稀粘。这时，父亲睜开眼，断断续续地說：“我不行了，……往后，只靠你一个人拉扯孩子們了！”不久，父亲就闭上了眼睛。这时邻居們也来了，大家安慰母亲，又帮助我們用半張破席把父亲裹了裹，抬出去了。旧历九月里，天已經冷了，再加上是半夜，小風嗚嗚一吹，就更冷了。我只穿着一件露屁股的破单褲，一件破小褂，弟弟連条褲都沒有，光着屁股，

穿一件母亲的补釘罗补釘的白褂子，冻得浑身哆嗦，跟在人后面。我們一边走，一边哭，就这样把父亲埋了。

逼 債

父亲死后，家里除了两間土坯堆的房子，什么也沒有。剛埋了父亲，正当我們一家哀哀无告的时候，地主刘殿选就来逼債了。他硬說父亲活着的时候借过他十五块钱，逼母亲还債。那时，我們已經靠討飯过日子了，哪里有錢还債呀。母亲就央求地主等我們长大了再还。地主刘殿选就派人送来一張条子，要母亲在上面按个指紋。母亲以为是地主答应以后还債了，就按了指紋，誰知上了地主的大当。原来条子上写的是一年不还还要四块五的利息。事后母亲听說这事，就要找地方去說理，可是那年头的官府哪里会給穷人作主？！母亲被乡亲们劝住了，只好赶紧想办法还上这笔閻王債。母亲实在沒有办法，就托人卖房子。我們这两間房正临地主刘殿平的后院，地势又不好，很久也卖不出去，只有卖给地主刘殿平。地主刘殿平也早就想要这两間房。可是他看我們要卖，却故意装作不願买，好逼我們少要價錢。当时这两間房本值五十块钱，但他只答应出我們欠地主的十五块钱，多一分錢也不要，母亲只好把房子卖給他，抵了債。卖了房子，母亲本想刘殿平可能会容我們暫住几天，可他們不仅沒容，还逼我母亲改嫁，讓我們立刻搬走。母亲一听，眼泪像断了綫的珠子，簌簌地掉了下来，她气愤地說：“孩子們已經沒了爹，我不能再讓他們沒了

娘！”說完，她領着我們，把家里仅有的一床破被和一個破砂鍋拿着走出了上房。

當長工

我十四歲的時候，就到地主劉殿奎家當長工去了。剛去不久，就趕上鬧大水。一天，劉殿奎叫我上地里打撈高粱，我光着腳在水里走，被高粱茬划破了腳，一條三寸多長的大口子直連到骨頭，流血不止。可是，劉家地主早就給長工立了條“規矩”，不到日頭平西不準回家。我只好忍着痛，等到天黑。天黑時，我回去了，劉殿奎明明看見我滿腳泥血，却連問也不問，就逼着我扛糧包。

給劉家地主干了一年，他只給了我點兒棒子，這哪里還是棒子！早就讓蟲子吃得只剩下空壳了，放在水里全都漂着，蒸出的窩窩，一股子蟲子屎味兒。沒過多久，我就離開了劉殿奎家。

離開劉殿奎家，我心想再也不給地主當長工了。可是那年初，窮得無立錐之地的農民，不去當長工又有什么辦法？轉來轉去，我還是轉到了地主家當了長工。這個地主叫劉樹功，他和他那已死的老子——老地主劉汝棟以及地主劉殿奎一樣，都是谷糠里還要軋出三分油的吝嗇鬼。

那年臘月二十四，刺骨的北風嗚嗚地叫，吹在臉上就像針扎似的，地主劉樹功讓我去拉水。我坐在車上趕牲口，凍得兩條腿一點兒知覺也沒有了。劉樹功跟着押車，他渾身上下捂得嚴严实實，里面穿着棉的，外面罩着皮的，坐

在車上活像一只狗熊。别看这小子穿得这么厚，可他还是嫌冷，拼命打牲口快跑。牲口跑到村口的时候，忽然从村外又过来一辆大車，牲口惊得跳了起来，把我甩下車去。我本想躲，可是两条腿早已冻得麻木，再也不听使唤，眼瞅着車轆轤从我腿上軋了过去。我的腿被軋断，雪白的骨头茬儿露在外面，褲腿和鞋全被血浸透了。住在村口的乡亲们见我受了伤，赶紧把我抬到車上，送回刘家的长工房，找刘树功請先生給我接骨包伤。

快到半夜的时候，先生来了。他先叫人端灯看看我的伤，又把我住的长工房看了一遭，便坐在板凳上等地主刘树功发話。原来这先生已經明白了我的身份，現在专等地主开腔，他好見風使舵。

果然，地主婆刘树功的母亲开腔了。她酸溜溜地說：“連头牲口都管不住，軋断了腿活該！”先生一听地主推卸工伤的責任，就明白他一定不会出錢治伤，而长工本人，穷得連条棉褲都沒有，又怎能拿出錢来接腿？！想到这儿，先生便順水推舟地說：“这孩子的腿完了！你們想治，就另請高明吧！”他說完，給留下一包儿药粉，把断腿捆了捆就走了。那时，我咬着牙想，地主欠下的这笔債早晚会跟他算清的。

过 年

腊月二十九，地主刘树功怕我在他家过年冲了他的运气，就赶我出去。这天，他滿臉阴笑地来到长工房，眨着

耗子眼說：“福章，你一个人在这冷冷清清的多别扭！回家过年去吧！也省得让你娘惦着！”我一听气憤极了，就說：“好，走就走，我早就不願意在这呆了。”地主派人用椅子把我抬回家去。

母亲見我回来了，又高兴又难过，急着要看我的伤口，又忙着問我吃过飯沒有。其实，即使母亲看了我的伤，也知道我已經几天咽不下东西，她又有什么办法？！

有錢人家过年，沒錢人家过关，这在旧社会一点儿不假。正是地主家張灯結彩、飲酒寻欢的时候，我家和村里的穷乡亲们却不得不餓着肚子，插門睡觉。

旧恨新仇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。这一年的年底，八路军解放了我的家乡。但是，正当村里穷苦的农民成立农会、建立民兵、清算地主恶霸闊翻身的时候，原来当过日寇大乡长的汉奸刘喜杰，勾結了蔣介石国民党反动势力，招兵买馬，成立了还乡团，于一九四六年五月，趁麦熟的时候，向区里、村里进攻了。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，村里为了保存力量，民兵和农会便掩护烈軍屬和乡亲们撤退。那些穷凶恶极的亡命之徒，叫村里的地主秦真明带路，到处找地洞，他們見农村干部就杀，見农会会员就埋，見粮食就燒，見財物就搶。沒有来得及隱蔽的烈軍屬，有的被打得血肉模糊，有的却被綁架，限期让村里拿粮拿錢去贖，农会干部的家，更是被洗劫得一干二淨，村里籠罩着

一片烏云。

当时，我弟弟是村里的民兵，我家也分了刘喜杰的粮食和地，还乡团也来搜查我家。但是我和弟弟已經轉移，他們沒有找到，却正好碰見母亲。还乡团把我家砸得稀烂八糟之后，又把母亲捆起来，帶到村东北角上一間空房子里，这間房，是还乡团特意騰下来，用作折磨村干部用的，墙上、地下，已經沾滿了血迹。

匪徒們将母亲帶到屋里，立逼着她說出弟弟和我的去向，母亲死也不說，被他們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就扔到門外不管了。

夜里，我回来一看，村子已經被毀得不成样子，母亲被乡亲们偷偷地送回家来，躺在炕上已經奄奄一息，沒有熬到秋天，就含恨去世了。

在 小 站

自从这次还乡团反攻倒算，村里的地主、反动势力又猖狂起来，他們重新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貧苦的农民再次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把对階級敌人的仇恨，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。

母亲去世不久，我便怀着悲憤的心情离开家乡，流浪到天津郊区小站。

小站这地方土地肥沃，以盛产稻米聞名。但是，解放前，这些土地同样是被地主霸占着，这些地主自己不劳动，农民辛勤劳动一年的果实，却像潮水一样涌进他們的粮

仓。地主們从經濟上剝削农民，还对农民进行人身迫害，农民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。

那年，我正給地主侯玉亭扛活。有一回，我挑着油挑子路过恶霸地主魏奎元的門口，他家的狗見我破衣拉杂的样子，追过来就咬，一口下去，我的腿立刻鮮血淋淋。我一急，掄起扁担就打，把狗的一条腿打断了。当天下午，我正在地里干活，和我一起下活的长工气呼呼地跑来，跺着脚說：“糟了！姓魏的派人来害你，还是快躲一躲吧！”几个穷弟兄不容我說話，就七手八脚地将我拉到小船上，送进一片葦塘地里。我在葦塘地里整整躲了三天三夜，第四天，我就离开小站奔到天津。

出了牢籠又入虎口

到天津投奔哪儿呢？这时，我想起父亲在世时曾經告訴我，我有一个本家哥哥在这里。我和哥哥还从来沒見過面，只知道他在北站一带干活儿，打听了好多日子，才在北站工务工区里找到他。兄弟俩剛見面，誰也不認識誰，我把一家死的死、亡的亡的情况一說，两人都忍不住哭了。哥哥說：“就住在我这里吧！只要我有口吃的，就不能让你饿着！”

哥哥一个月也掙不了几个錢，拉家带口的，本来就有上頓沒下頓，再添上我，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后来听說南站用装卸苦力，哥哥就硬着头皮去見韓監工，托他把我荐进去。和韓監工一提，他就說：“这事不好办，我也得托付別

人，現在光動嘴不行，還得花點錢，沒錢就辦不成。”哥哥着急地問：“得要多少錢？”韓監工一伸手指頭說：“得這個數——一百万。拿出來，好商量；拿不出來，散！”哥哥一聽就楞了，這不明明是敲竹杠嗎？！上哪兒弄這些錢去！但是韓監工已經有言在先了，少一個也不行。哥哥實在沒有辦法，就連夜向親友籌借，費了很多周折，总算湊足了一百万塊錢，統統交給了韓監工，我這才在南站上了班。可是我一個月工資才二十五萬，除了吃飯，干兩年也還不上這一百万塊錢的債。

進入鐵路，我心想，這回可熬出來了吧！哪知道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地主、資本家、把頭都是一路貨。他們肩不動，膀不搖，工人像牛馬一樣勞累，用血汗換來的錢，却都入了他們的腰包！加上小把頭從中剝皮，落到工人手里就寥寥無幾了。物價一日三漲，窮人簡直無法生活，真是出了牢籠，又入虎穴。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天津快解放了，南站的封建把頭們个个驚慌萬狀，站里的秩序一時被他們攪得烏七八糟。這時，管倉庫的一個姓孫的家伙（孫是農村被鬥地主，逃亡到天津，解放後已被鎮壓），便趁機混水摸魚，他勾結偽警，一上午的工夫就拉走一千多袋白面。事後他怕這骯髒勾當露出馬腳，就出了個壞主意，想嫁禍于人。可巧，我和十幾個工人正在這倉庫附近干活兒，我們的褂子也脫下來放在這個倉庫里。我們十幾個工人干到中午，該吃飯了，就到倉庫里穿衣服。誰知，就在我們穿衣服的時候，這姓孫

的小子就突然从仓库后面蹿出来，“哐啷”一声把我们锁在仓库里了。我们一时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

正当我们喊人开门的时候，这姓孙的就带着站长和车站的一个国民党军官来了，后面还跟着两个挎盒子枪的家伙。姓孙的把库门打开，指着我们说：“面都叫他们偷走了！”我们这时才明白，原来这小子正在陷害我们，立时怒不可遏。那反动统治阶级的走狗——国民党军官，尽管他的命运已危在旦夕，但在这最后的时刻，他还在迫害工人。这时，他杀气腾腾地朝我们吼道：“快说，你们偷走多少面？”我实在气愤极了，也向他喊了起来：“我们是来拿衣服的，被人陷害了。偷面的事你去问……”姓孙的小子一看我要喊出他的名字，像是疯子，跳到那国民党军官面前，抢着说：“面是他们合伙弄走的，没错儿！这群小子没一个好人，特别是说话的那个，得狠狠地打！”那军官不容我们再说一句话，连忙向卫兵递了个眼色，卫兵顺手从破地板上折了一块木板子，先朝我打来，我咬着牙，硬挺着，心说“打吧！看你们还能横行几时！”打到第二下，板子“嘎巴”一声断了。这小子还不肯罢休，又找了一块木板，这块木板，头上有颗钉子，一下子正打在我的手心上，鲜血“噗”地一下子喷了出来。他们打完了，又扔给我们每人一张“停薪留职”的字条——就这样把我逼出南站。

苦尽甜来

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，解放的炮声响了，天津城上

飄起了人民勝利的紅旗。天津解放不久，我就重新回到南站上班。

有黨和人民政府給我們作主，那些喝盡了工人鮮血的封建把頭們被斗倒了，根據他們的罪惡事實，人民給他們應有的制裁。那些小把頭們，由於失去了靠山，再也不敢仗勢欺人了。不久，工人們成立了自己的工會，還派代表參加管理國家大事，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，真正翻了身，成為國家的主人。翻身後的喜悅心情，時刻激勵着工人們的幹勁，我和其他工人們一起，在黨的培養教育下不斷地進步着。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，這是我永遠也不能忘記的一天，這一天，黨接受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晚上，我興奮得一夜不能入睡，黨支部書記的話又在我身邊響起：“劉福章啊！可不能忘本。現在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沒有得到解放，一定要永遠記住勞動人民在舊社會的大仇大恨，把革命進行到底。”

在生活上，黨同樣是無微不至地關懷着我們。解放後，一幢幢的工人新村建築起來，工人們從原來的“破瓦寒窯”搬進了寬敞、亮堂的工人新村。那時，領導上了解到我家遠，就特別就近給我找了两間家屬宿舍。搬家那天，我全家心裡都樂開了花，瞅瞅屋裡，看看門外，眼淚不禁流了下來。我情不自禁地說：“毛主席呀，是您救了我，救了我們這些受苦受難的窮弟兄們。”

（天津站老工人家史編輯小組 整理）

翻身不忘昔日苦

天津制革厂 苑广金

一九五九年八月的一天，工会主席老楊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我一进門，他立刻笑呵呵地向我走来，拉住我的手說：“老苑啊，祝賀你，你要到北京开群英会去了！見到毛主席，可別忘了替我們問候。”一股热呼呼的暖流立刻傳到我的全身，我激动得一时說不出話来。同样是工人，在新旧不同的社会制度下，境遇却是那么不同：过去的奴隶，今天成了国家的主人。

我的老家在河北省大城县小店村，解放前，那儿是有名的洼地，子牙河和南运河都順着那淺淺的河床，波濤滾滾地流向渤海。由于年久失修，河道淤塞，两岸的农民常年受着洪水的威胁，万恶的地主阶级，更是趁火打劫，借此机会坑害农民，多少农民因此卖儿鬻女、流浪外乡家破人亡！

我記事的时候，家里有父亲、母亲、我，和两个光棍大爷，住着三間茅草房，还有几亩十年九不收的薄地，父亲和两个大爷只得常年在外給地主干活儿。那时，父亲是給地主刘大瓦房家干活儿，他白天在地头干了一天，晚上

还得推磨，父亲連餓帶累的只剩了一把骨头。一年冬天，地主家要盖房子，那正是三九天，他們却让父亲連夜垫庄禾（打地基），父亲沒有棉褲，从此便得了严重的寒腿病，起不来炕了。

父亲一病，愁坏了母亲。父亲能干活的时候，我家还吃糠咽菜，如今，連糠菜也吃不上了，更沒有錢給父亲治病。父亲看我餓得整天哭喊，他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，就一面忍着疾病的痛苦，一面减少自己的飯食。父亲被疾病和飢餓，整整折磨了三年，終于在一个風雪的夜晚去世了。

父亲死后，我家求邻告友，費了好大周折才把二亩薄地押給地主，借錢埋了父亲。两个光棍大爷的日子，本来就过得結結巴巴，父亲病倒这三年，更是让我们扯得整天空着半个肚子。父亲死后，母亲不願再拖累他們，就帶着我，到天津当了佣人。旧天津，是个罪恶聚集的地方，我和母亲又是从农村来的孤儿寡母，受尽了顾主的欺辱。他們动不动就打罵母亲，我便成了他們的眼中釘。两个大爷听說我和母亲在天津的境况，急得团团轉，說宁肯把我們接回去一起餓死，也不能眼看着我們受人欺辱，就決定接我們回去。一天，二大爷怀里揣着几个糠窩窩，起了个大五更，便上路了。他走累了也不肯歇一歇，走餓了就喝口水压一压，定定心，在第三天清早，終于找到我們。他見到母亲和我，還沒說話，眼泪就流出来了，哭了一陣，才說：

“帶着孩子回家吧！我們老兄弟俩無論怎么受罪，也得养活你們娘俩！”

我和母亲回来，两个大爷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干活，大大爷已经上了年岁，加上长期贫困生活的折磨，身体早就支持不住了，不久，二大爷也吐了血。母亲被生活逼得实在没了办法，后来，便改嫁了。我就跟两个光棍大爷过着苦日子。

我十四岁的时候，日寇对河北大平原进行了残酷的扫荡，实行了三光政策，村里再也呆不下去了，两个大爷就托人把我带到天津找活路。来天津不久，我就到一家洗衣房里当了学徒。

这个洗衣房坐落在现在的河西区下瓦房西头，当时这里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窝铺，还有那臭气熏天的髒水坑，以及堆得像小山似的垃圾堆，唯独这洗衣房，孤零零地立在靠水坑的一片空地上，灰色的砖瓦房，高高的洋灰台阶，大门外是两排杉篙绑成的挂晾架。夏天，这里苍蝇蚊子滚成团，长尾巴蛆到处爬。我开始想，熬几年兴许学会点本事，哪知道，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一付骨头架子了，干了半年又加上浑身斑斑血迹。每天，天不亮我就起来捅火，拾掇做活的案子，伺候老板和老板娘洗脸、漱口、倒尿桶、倒脸水、买早点……，早晨忙完了，就开始挑水，每天挑二三十担净水，还得倒二三十担髒水，一个十四岁的孩子，怎么能担起这样沉重的活呀！到了冬天就更受罪了，十冬腊月，西北风刮得呼呼的响，我身上还穿着破夹衣，寒风刮到身上，真似刀割一样的疼啊，我的手脚也都冻得溃烂了，严重的冻伤，终于痛得我下不来炕了。我伤成

这样，老板硬說我是偷懶，不給我飯吃，說：“人歇嘴為啥不歇？”我的冻伤越来越重了，两条腿肿得像棒槌，手和脚上的冻疮也往外流黄水。二大爷听說后赶来看我，他不看还好，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。他撫摸着我的腿嗚咽了半天才說：“孩子，想不到到处都是火坑！跟我回家吧！”我要走，資本家說啥也不答应，这个狡猾的家伙，明知我这病不定哪天才好，更說不定会落成殘廢，确实干不了活儿了，可是一看二大爷想接我走，他反而装起腔来，想借这机会敲竹杠，就眨了眨老鼠眼，撒起賴来，說：“想走，沒那么便宜的事，得把飯給我吐出来！”二大爷馬上就明白了这条狐狸的心思，忍气把准备給我治伤的几个錢全部掏給了他，我才逃出了火坑。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，就是这样，白干活不給工錢，到了，还得倒給他錢！

开春以后，我的伤慢慢好起来，就又来天津找活干。开始，我只能在万德庄一带的人市上找些活，当短工，后来就到太平电綫厂去干活儿。

太平电綫厂是日本帝国主义开的，工厂不大，生产条件恶劣，在这里干活儿的多半是些童工，饥饿和繁重的劳动，把孩子们折磨得个个面黄肌瘦。工人们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，却連起碼的生活也維持不了。更使人气愤的是，侵略者根本就不把工人的安危放在眼里，車間里，天軸、地軸上，全沒有安全設備，工伤事故接二連三地出現，一年到头，不知有多少劳苦人民的子女，把生命断送在这里。

一天，剛上班不久，童工們已經开始了緊張的劳动，

天軸和地軸隆隆的响声，震得小小的車間晃晃蕩蕩。这时，日本工头来查班了。他手拿皮鞭子，倒背着手一个一个地查看工人，看工人们沒有闲着，就查看机器。他抬头看看天軸，低头望望地軸，側耳听听机器的响声，又圍着車間轉了一遭，才又回到我干活儿的地方，然后拍了拍我旁边的一个孩子的肩膀，說：“你的……上去，天軸的加油干活！”这个孩子从来沒有干过这个活儿，加上亲眼看見过天軸上发生过的悲惨的工伤事故，便犹疑起来。他本想告訴工头說他不会干，可是看了看工头手里的鞭子，把話咽了下去，便含着眼泪，順着梯子慢慢地爬了上去。头顶的天軸隆隆地响，震得孩子头昏脑脹，孩子又往下看了看，下面的地軸也隆隆地轉着，他赶紧抓住梯子眯上眼睛。工头看他不上爬了，气得直跺脚，就抻着脖子喊：“快快的，快快的！”突然，一声惨叫，惊动了整个車間。大家抬头看时，只見童工已被天軸卷起，正順着天軸轉动的方向飞快地轉着。一位老师傅立刻明白了将要发生的慘劇，就搶上一步，猛力拉开电閘。但是，已經来不及了。天軸仍然在轉，孩子的胳膊和腿都絞断了，一段段地从天軸上掉下来，墙上、地上沾滿了鮮血，孩子的喊叫声也停止了……。工房里立刻沸騰起来，一些老工人含着眼泪把这孩子的尸体一块块地拾起，放在破木板上，又用一块麻袋片蒙上，抬着去找日本資本家，童工們哭着，跟在后面。在办公室的外面，工人们憤怒地高呼：“馬上安装安全設備，給死难家屬撫恤金。”“已經送了这么多人命，我

們不干了！”听到工人这憤怒的吼声，日本鬼子害怕了，他們派出一个翻譯，向工人們“保证”一定采取措施。

看到这次发生的事故，我們好几个童工再也不願在这里干活了，又一起到市上去卖短工。

一九四四年，我到輝东制靴株式会社干活儿，一天干十二小时，只給两个窩窩：中午一个，晚上一个，早晨只給一碗稀得几乎看不见米粒的高粱米粥。工人們的住处，簡直是座活地獄，数九寒天風雪交加，学徒們的破被子盖住脚盖不住肩，盖住了肩又露出了脚，所以工人們干脆就把被子连头蒙上，再找些碎麻袋片搁在脚上。劳动强度大，生活条件恶劣还不算，日本鬼子和汉奸还想尽了坏招儿折磨工人，从思想上奴化工人。厂里給工人立了无数的“規矩”：每天早晨工人們喝粥之前，得先排队站好，双手捧碗，闭上眼睛，嘴里念叨什么：“粗茶淡飯，全靠神佛慈悲”，再面向东京的大鬼子天皇和南京的大汉奸汪精卫进行“遙拜”。工人們本来就恨透了这些鬼子、汉奸，加上这么一折腾，更是恨上加恨。所以每当鬼子領着大家念到“向东京遙拜，向南京遙拜”时，工人們就故意念成“东京要敗，南京要坏”。心想，看你們还能逞凶几时！

这个厂还有一条“規矩”：不管是严寒还是盛夏，工人們每天早晨起床之后，一律要出操跑步。工人們整天餓着肚子，誰还有那閑情逸致？誰又能經得住这么折腾！有人勉强跑了两三圈就昏倒在地，有人想稍微歇息一下，便遭到毒打。他們打人，还不許人哭，不許人躲，不然，就越

是往死里打，有的工人，被打得几天下不来炕。

住在工房的工人，平时也不准随便出入，誰要違反这条“規矩”，不是打就是罰，工头們常常借此机会向工人敲詐勒索。有一次，我們新来的几个年輕工人一起出去玩了一会儿，不料，被工头知道了。我們剛回去，他便提着馬刀走来，进門就喊：“你們干嘛去了，嗯？”我們只好說了实話。可是工头想敲詐我們，就装成不相信的样子，唬我們道：“什么？出去玩？你們私通八路还当我不知道？把他們統統給我送到白帽衙門！”尽管他真事儿似的在那里大喊大叫，可是工人們早就知道了他那葫芦里卖的是啥药，全不理他。几个調皮的小伙子看工头那狼狽相儿，也憋不住了，一面作着鬼臉，一面用手捂住嘴哧哧地笑，这一下可把工头气坏了。他那大圓臉漲得像个紫茄子，用馬刀背狠狠地向我們砍来，又向那几个小伙子砍去。老工人們看出，事情发展下去工人准会吃亏，就跟工头說：“說他們私通八路也得有个凭据，馬馬虎虎地就送衙門，对你也沒好处。”这时，工头原先那股威風勁儿已經煞了下去，但他仍不肯罢休，便要起无賴来：“他們合伙破坏厂里的‘規矩’，得罰他們一个月的口粮！”我們一听就急了，說：“罰一个月的口粮，我們吃什么！不如开除我們倒痛快。”工人們也支持我們說：“把我們全开除吧！我們都不干了。”工头老实了，只好把我們每人打了一頓，出出气才算完事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，飞来了一批批的接收大員，鬼子統治时的汉奸、走狗，也搖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

紅人，他們整天忙着“劫收”，把工人的劳动血汗都“收”到自己的腰包里，工厂却連起碼的生产秩序也維持不了，干两天，停三天，一家老小要吃沒吃，要喝沒喝，工人們只得拖着瘦弱的身体去扛大个，拉胶皮，或者拉着老小出去要飯。

国民党把生产搞得一塌糊塗，却想出种种办法迫害工人，他們任意将工人关进禁閉室，工人迟到不但要遭到工头的打罵，还得罰你在厂訓牌前跪着“示众”，有多少工人因經受不住这种折磨昏倒在地；有多少工人因不堪忍受这种侮辱怀恨离开了工厂！在那黑暗的旧社会，受尽剝削和压迫的穷苦人民，已經飽尝了人間地獄的辛酸，所以天天盼，日夜盼，盼着那劳动人民出头的日子早日到来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，我們終於听到了那隆隆的炮声，这是天津解放的信号，是劳动人民翻身的信号，劳动人民的苦日子終於熬到了头。一月十五日，天津解放了。被压迫被剝削的劳动人民从此翻了身，成了国家的主人。厂里經過了民主改革及各項大运动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过去騎在工人头上的坏蛋，受到了应有的制裁，工人階級吐气揚眉，生产面貌也煥然一新。解放以来，我和許多工人同志們一样，在党的耐心教导和培养下，提高了思想觉悟，并在一九五六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在党的培养和同志們的帮助下，我改进了一些机器，掌握了一些新技术，我只不过做了些我應該做的事，但是却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視，給了我很大的荣誉，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三

年，同志們連續評選我為天津市的勞動模範、五好職工代表和天津市人民代表。想想過去，看看現在，這是多么大的變化！這變化又何止是我一個人！但是，我決不能好了疤癩忘了疼，要永遠跟着共產黨，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站穩無產階級立場，積極投入三大革命運動，並且把勞動人民在舊社會所經歷的苦難生活告訴後代子孫，叫他們永不忘本，永遠革命。

（張崇仁 整理）